

吉庆街曾有一支日军“笔部队”

1938年的武汉，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文艺家救亡图存的时候，日本也成立一支“笔部队”煽动战争狂热。

战前，日本推行“侵华国策”，倡导“国策文学”，成立“日本文学报国会”，为其制造“法理依据”。1938年8月，为进攻武汉组建“笔部队”，动员作家参军，给予佐官级待遇。内阁情报部长横沟光晖发表《去汉口，去汉口，剑与笔都是铁做的》，鼓噪“体验日本精神之精髓，于发扬日本精神上发挥作用”。

攻占武汉后，“笔部队”驻扎汉口吉庆街鼎新里，挂上“军报道部”牌子。日本所有媒体必须使用军报道部的通稿，不许自行发布消息，很多送审照片加盖“不许可”印章长期封存。

“笔部队”成为法西斯机器的一部分，严格执行七条规定：（1）不得写日本军队的失败；（2）不得涉及战争中所必然出现的罪恶行为；（3）写到敌方必须充满憎恶和愤恨；（4）不得表现作战的整体情况；（5）不能透露部队的编制和部队的名称；（6）不能把军人当做普通人来写，必须把小队长以上写成沉着勇敢的人；（7）不能写有关女人的事。因而，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侵略者成了“天使”，杀人魔王成了“国家英雄”，占领区成了“王道乐土”。

“笔部队”有两对“男女明星”——石川达三、林芙美子，火野苇平、吉屋信子。

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因透露“南京大屠杀”实情，被判处“违反新闻法”获刑，但又派他到武汉“戴罪立功”。在武汉采访一个月，他写出长篇小说《武汉作战》，一反前行，大肆渲染日军的“文明之举”，把侵华战争营造成“和平圣战”。

火野苇平更不遗余力，接连推出《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三部曲，以“宏伟的战争”美化侵华行径。

林芙美子早就“出圈”，侵华战争一打响，便送丈夫手塚绿敏参军，赚得“军国之妻”光环。1938年11月，她第一个到汉口，戴上“战地玫瑰”桂冠。《朝日新闻》以《笔部队的“功勋甲”林芙美子女士奋不顾身进入汉口》为题，追捧“林女士的汉口入城，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她迅速报以《战线》《北岸部队》，政府和军部大力追捧，创下畅销书之最。书中的描述极为冷血，“道路上中国士兵死伤累累，完全激不起我的一丝感伤，即便连一瞬间的触动也没有”“那个中国士兵的尸体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物体，对刚才被担架抬走的我方士兵，我有深入内心的感伤和崇敬”。

吉屋信子也不甘落后，《汉口攻略战从军记》竭力为日军罪行开脱，以充当“军国之母”为荣。

战后，“笔部队”的罪行没有清算，个人也无所反省，石川达三甚至称：“我不后悔，假定日本再打一次战争，我仍然极有可能再一次重复同样的错误。”这也警醒我们：不能忘了“剑部队”的如狼似虎，也不能忘了“笔部队”的为虎作伥。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 菲 杨 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刘海燕
李文洲 李敏娟 张冰峰 张智勇
陈红英 林 伟 唐云峰 谭艺琴
潘红莲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章旷怡

编辑：许 濛 刘 玮

封面设计：王 鹏

阅城偶记

<<< <

1 吉庆街曾有一支日军“笔部队” / 简 桦

时代年轮

<<< <

4 1975，“武汉”牌手表拨响时针 / 肖 捷

风雨同舟

<<< <

9 为农代言：以科技之力，守护健康之源 / 聂先元

九城同心

<<< <

13 鄂楚风骚逐江流（上）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鄂州元素 / 邱 风

目录

CONTENTS

委员天地

<<< <

- 17 汉阳江风暖 医者仁心长 / 熊 涛 (口述) 章旷怡 (整理)
21 书香致远, 做幸福阅读的点灯人
/ 王 婷 (口述) 银 华 (整理)

商聚汉皋

<<< <

- 25 踏准时代的节拍, 做有温度的装修人 / 杨道成

烽火江城

<<< <

- 28 战时首都: 抗战机关旧址
——武汉抗战遗迹巡礼之二 / 邓正兵 王 钢
37 鹰击长空 (上) ——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九 / 涂文学
44 中共在武汉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 / 程子莹
51 “三毛之父”在武汉 “漫画抗战” / 翁婉琳 吴继金
57 郝梦龄将军之女郝慧英采访记 / 尹新秋

人物述林

<<< <

- 61 笔墨六十载, 穎偬岁月稠 / 孙恩道

主 管: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 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 《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 《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 CN42-1056/K

印 刷: 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每月 28 日

定 价: 8 元

地 址: 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 430010

电 话: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1975，“武汉”牌手表拨响时针

◇ 肖 捷

轮印：50年前的1975年9月，武昌中北路岳家嘴，武汉钟表厂新厂竣工投产，随后更名为武汉手表厂。当年成功生产13万只“武汉”牌手表，1987年荣获“武汉市优质产品”称号，1991年荣获北京国际博览会银质奖章。手表机芯打入国际市场，累计出口508万只。

20世纪70年代，武汉年轻人结婚流行“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尤其青睐上海产的“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飞鸽”或“永久”牌自行车。其次，则是武汉产的“武汉”牌手表、“黄鹤”牌缝纫机、“黄鹤”或“永光”牌自行车。

武汉产“三大件”，品质上虽无法与上海产品媲美，但也广受消费者喜爱。“武汉”牌手表情达国家一级表标准，不仅在武汉地区畅销，还远销长江中上游和北方地区，甚

至打入海外市场。直至今日，它仍然是深深镌刻在武汉人记忆中的时尚象征。

追溯武汉钟表制造史，发现“武汉”牌手表不仅是一代武汉人的情感所系，还见证了武汉当代工业文明的兴盛及中国制表业的飞跃，更彰显了武汉制表人的技艺传承和匠心坚守。

红旗钟表厂探索起步

钟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的机械结晶。远古时期，初开蒙昧的先民仰观日月星辰，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然节律，在昼夜交替和四季更迭中感知时间的流转。随着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深入，立表、日晷、沙漏等计时器具不断涌现，为人们提供不受昼夜、天气限制的计时方式，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推动生产、改造自然的得力助手。



“武汉”牌单历手表和双历手表

进入 17 世纪，计时器具飞速发展。地球西半球的德意志与荷兰，凭借先进工艺与创新精神，制造的钟表以精准度与艺术性闻名遐迩，在世界钟表业确立了领先地位。到 18 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席卷而来，彻底改写了时间计量的历史。英国以技术革新与规模化生产优势后来居上，将钟表制造推向新的高度，迅速崛起为新的领军者。机械钟表将时间切割成精确的刻度，成为现代科技最精准的时间标尺，见证着人类对时间掌控力的飞跃。

1549—1560 年，4776 名法国逃难者涌入瑞士日内瓦，其中有 1536 名工匠带来宝贵的技术与资金，从事普通钟表制造，为瑞士钟表的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日内瓦逐步发展成为世界钟表业的摇篮。

当世界钟表业呈现百舸争流的景象之时，中国钟表业才刚刚踏上探索之旅。清咸丰二年（1852 年），上海抛球场后马路（现天津路河南路口）出现张恒隆钟表店，以手工制造插屏钟。不久，德国霍普兄弟在上海开设亨达利钟表行（后转售于孙梅堂、胡春泉），专售世界各国名表。1912 年，孙廷源、孙梅堂父子将 1906 年在宁波开设的美华利制钟厂迁来上海杨树浦。之后，上海钟表业

进入发展时期，中国时钟厂、上海中美钟表公司、三星钟表公司、时永钟厂、乃桥钟厂、震亚钟厂、百老汇电机公司（上海电钟厂前身）、亚洲钟厂、华强钟厂、远东钟厂、时民钟厂、文华钟厂以及金属表带、表壳、表油、发条、游丝、玻璃钻眼、木壳、表面、表针等近 200 家零配件厂相继开业，使上海成为我国钟表制造业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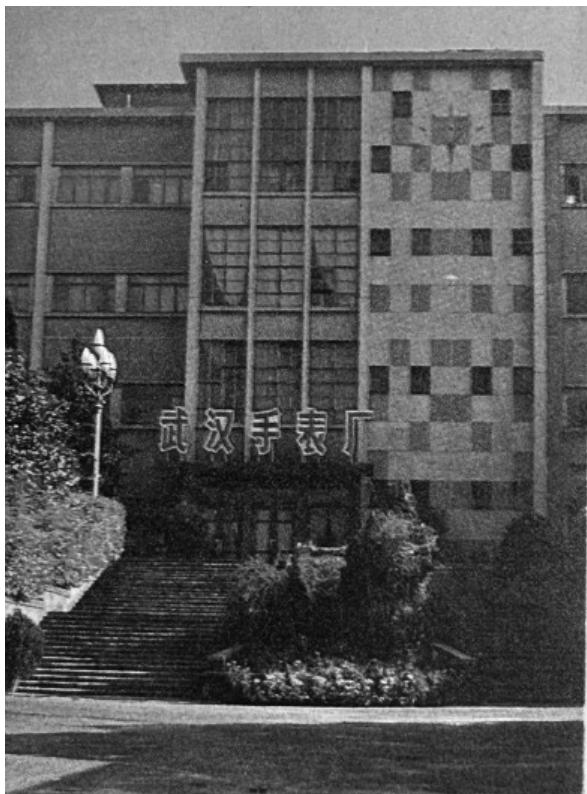
此时，作为中国工业重镇的武汉钟表生产明显滞后。据《汉口商业月刊》1936 年第 1 卷第 12 期载：“钟表眼镜业在汉口市场上，亦有三、四十年之历史。最初仅志成眼镜公司及亨达利钟表行等三家。”其后虽有所发展，但皆以销售、维修钟表为主。直到 1958 年，武汉市百货公司钟表批发商店抽调 50 余人成立红旗钟表厂，武汉钟表制造才熹光微现。

武汉红旗钟表厂位于汉口中山大道 1154 号，以生产“武汉”牌双铃闹钟为主，建厂当年就试产出 400 只，1959 年形成年产能力 1 万只，1960 年达到 2 万只。此后因产品滞销，改产金圈、表面等手表零件，1964 年再次转产无线电元件产品，武汉红旗钟表厂名存实亡。

值得欣慰的是，红旗钟表厂的闹钟生产虽已按下停止键，但钟表制造的种子已在江城埋下。

武汉手表厂扬帆启航

武汉的手表制造业，是伴随新中国的工业建设逐步发展起来的。武汉解放后，列为国家重点经济建设城市之一，武汉工业得到



迅速恢复与发展，“一五”时期又掀起工业建设的高潮。在苏联的援助下，建成以重工业为主，以冶金、机械制造、纺织三大支柱产业及食品、化工、医药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武汉工业化进程频奏凯歌。

1970年1月，根据湖北省革委会产字（70）236号文件精神，武汉市商业局成立武汉钟表厂筹备组。由于武汉在手表生产与研发领域处于空白状态，筹建一座现代化手表生产厂，首先面临人员、技术等资源匮乏的难题。然而，凭借坚强意志和满腔热情，选定汉口吉庆街156号作为厂址，迅速派遣人员四处学习借鉴先进技术，积极推进展钟和手表的试制，为武汉钟表厂正式投产攻克一系列难关。

1971年1月，武汉市政府将武汉钟表厂划归市第一轻工业局管辖，厂址也从吉庆街迁至汇通路。当时，第一轻工业局成立不久，对钟表制造业务还比较陌生，但局领导

经过深思熟虑，按照国家轻工业部的统筹规划，与沈阳、天津、重庆、洛阳、南昌手表厂合作，组建六厂协作组。同时，自身下功夫开展手表制造技术研究，联合武汉金笔厂等27家单位，仿制手表生产设备和自制各类手表元件，终于在7月1日成功试制出统一机芯的手表52只和带日历的闹钟30台，向党的50周年生日献礼。

这52只统一机芯的手表，实现武汉手表制造从无到有的突破，标志着在技术方面拥有了坚实的保障。随即，武汉钟表厂确定在武昌中北路岳家嘴建设新厂，紧锣密鼓进行筹备。

岳家嘴相传曾是宋代岳家军的军船码头，地处武昌郊区，既没有公共汽车通行，也没有路灯和自来水，更看不到商业网点的影子，到处杂草丛生，大家借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个荒凉地名，戏称为“夹皮沟”。

1973年底，武汉钟表厂新厂破土动工。1975年9月，主体工程竣工，迅速投入生产，成功生产出“武汉”牌手表13万只。1976年，全部工程完工，一座占地面积达505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2108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在东湖之滨拔地而起。同年，武汉市计委批复，把闹钟生产任务交由武汉钟厂（由武汉墨汁厂转型）承担，武汉钟表厂更名为武汉手表厂。

武汉手表厂由生产区和生活区两部分构成，主厂房配备了恒温空调以及防尘、消声等设施；生活区陆续兴建了职工宿舍、托儿所、幼儿园、阅览室、游艺室以及各类运动娱乐设施。在发展的高峰期，还设有一所技工学校。

1973年，湖北省科委鉴于我国手表业在精密零件检测方面存在测盘误差大、无法

定量测量、效率低下且严重影响工人身心健康等问题，委托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信息工程教研室光电科研小组的张篮球、冯功、朱定华、吴昆德、韩德湘、曹玉琳、徐波等科研教学人员，与武汉手表厂联合成立课题组，开展手表摆轮端面跳动和径向跳动的自动检测与自动分类研究。1983年，成功研制出OES-1型手表摆轮自动检测仪，改变了我国精密零件落后的检测方式，为武汉手表厂的品质控制创造了良好条件。

武汉手表厂不仅是湖北省唯一的手表生产厂家，亦是中南地区的第一家手表厂，计划投资1450万元，实际达1535万元，设计年产能为30万只统一机芯手表。

“汉表”达到国家一级标准

武汉手表厂的建成投产，改变了武汉市民手表需求完全依赖外省和进口产品供应的局面，开启了追赶世界制表业先进水平的征程。

1976年，武汉手表厂生产技术进一步取得突破，基本实现部零件自给自足，武汉一跃而成为全国38个手表生产基地之一。1977年，年产量达51600只，实现盈利8万元。

1978年，武汉手表厂敏锐捕捉改革契机，对内灵活开展经营管理，对外积极拓展开放合作，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1980年，手表年产量达35万只，超越了年产30万只的设计能力，产品包含大号、二号手表两个品类，并开始试制单历表。这一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830万元，手表质量得分87.01分。经国家轻工业部鉴定，武汉手表正式投入生产并投放市场。

此时，天高任鸟飞，市场需求急剧攀升，

武汉手表厂抢抓机遇，引进各类设备857台，其中大部分是国产一流专用精密设备，少部分关键设备从瑞士、西德、日本进口。此外，还构建两条手表外观件生产线，生产设备跃上新的台阶。

针对手表质量在全国处于中上等水平、手表品种单一及铜材供应紧张等问题，武汉手表厂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产品质量，推动产品向“三多”“两化”方向迈进——实现多品种、多花色、多功能和工艺化、装饰化。同时，开发高档镀金异型表，进一步开拓城市高端市场。

1985年，手表年产能从1982年的70万只提升到90万只，为设计产能30万只的3倍。产品质量以总分92.07分，达到国家一级表标准。手表样式新颖，日差在±30秒以内，连续走时36小时以上。品种日益丰富多样，从单历表、女式表，发展到双历表、景泰蓝挂表，拥有“武汉”“武当”“白鳍豚”“友谊”“星火”等50多个花色品种型号。同时，组装出第四代电子表。



武汉手表厂呈现出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武汉牌”手表更是成为品质与时尚的象征。

1980—1985年，武汉手表厂为国家创造利税7108万元，是国家对该厂总投资的6倍，连续6年稳居湖北省利税千万元大户行列。

从1987年开始，手表机芯出口打入国际市场，累计出口508万只，出口总额6270万元，为国家创汇801万美元。

东湖高新区转型突破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化，国内外知名手表品牌大量涌入武汉，手表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手表实施三次大幅度降价，给武汉手表厂带来巨大冲击，一度库存高达15万只。

面对多重危机，武汉手表厂并未消极等待，而是积极主动探寻变革之路，提出“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种求发展”的战略，进一步在“多”（多样化），“高”（高档高质量），“美”（美观精巧），“廉”（价格实惠）四个方面发力，提高产品竞争力。

同时，组建一支实力雄厚的销售队伍，深入湖北农村和大西南地区，建立600多个销售网点和120多个维修点，让老产品从滞销转为畅销。厂部与销售科签订销售承包合同，将销售人员的销售额与奖金、工资相挂钩。一时，销售人员每人携带好几百只手表（手表不能托运）送往销售点，积压的手表全部销售一空。外地采购人员纷纷前来，在厂里排起长队拿货，生怕拿不到。

但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严峻，全国手表市场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各类新型手表品牌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消费者的选择日益

丰富多元。同时，电子表、石英表开始流行，对传统机械表市场形成巨大分流。

恰在此时，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武汉东湖开发区诞生，武汉市政府在1994年将武汉手表厂整体划入，期望借助政策优势及改革活力，推动其向好发展。1996年，生产手表88.05万只，产值2900万元，实现利税总额24万元。

然而，面对趋于饱和的手表市场，武汉手表厂产品的更新换代依然滞后，导致连年产能和效益大幅下滑，只能依靠出口机芯勉强维持运营。

1997年前后，武汉手表厂生产线停止转动，曾经辉煌一时的“武汉牌”手表基本退出市场，原厂区后来开发为“东湖春树里”高档商住区。

2003年，武汉手表厂利用军品延时器的加工能力，改制成立武汉市天坦精密仪器机械工业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精密机械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为了顺应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潮流，该厂又研制开发出视力保健器、多功能潜艇钟、保健药盒、双历全自动手表等产品，还能承接加工碳钢、硬质合金刀具及精密齿轮、齿轴、精密模具等业务。

武汉手表制造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产品从仿造迈向自行设计，品种从单一变得丰富多元，铸就过“汉表”的卓然不凡。它是武汉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时代的前行与变迁。当人们偶尔翻出那块陈旧的“武汉”牌手表，跳动的仍是一代人的执着追求，以及一座城市对工业文明的深情回望。

肖捷，武汉图书馆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为农代言：以科技之力，守护健康之源

◇ 聂先元

人物名片：聂先元，民革武汉市委常委、经开区（汉南区）基层委员会主委，武汉市元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民革十佳党员”荣誉获得者。

我是一名民革党员，也是一名扎根农业、专注健康产业的民营企业家。多年来，我始终秉持“为农代言”的初心，坚持“以科技之力，守护健康之源”，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与时代同频共振，与民革同心同行。

深耕牛初乳，打造亚洲领先健康品牌

免疫力是最好的药！自投身牛初乳行业以来，我便立志将这份来自自然的馈赠，打造成惠及国民健康的民族品牌。

一头母牛只有在它产犊时才能产生初乳，而且，按照国际惯例，只有产犊后7天之内的乳汁才被称为“初乳”。7天内的“初乳”中，第一天最好，第二天的免疫活性物质下降了四分之一以上，随后下降比例逐天加大，7天后的成熟乳，免疫活性物质接近零。

牛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含量是人初乳的50-100倍，还含有各种生长因子，在增强免疫力、促进生长发育、抗氧化等方面有显著效果，被专家称为“乳白金”。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让更多人受益？”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记得第一次向家人提出要做牛初乳产业时，妻子担忧地说：“这行当太冷门了，风险太大。”但我心里明白，这不仅仅是一门生意，更是一份对健康的守护。

2003年，我创办了武汉市元大生物科



两会期间接受长江云新闻采访

技有限公司。因是门外汉，初期公司经营困难重重。对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不了解，走了很多弯路。我们一心扑在产品上，以为只要产品好就万事大吉，结果产品生产出来却卖不出去，看着仓库堆积的货品，那叫一个“愁”呀！

我积极向这个行业的专业人士“取经”，并全国各地跑市场找客户，凭借诚信和靠谱打动了不少老板，很快公司扭亏为盈。好不容易打通销售渠道，运营走上正轨，产品又在原料供应上遇阻，被卡了脖子。这一刻我意识到，只有依靠自身的过硬技术和实力，才能真正站稳脚跟。

于是我组建研发团队，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通过技术攻坚，利用复杂精细的提取工艺加工出牛初乳冻干粉，最大限度保留活性成分，并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延长保质期，极大地增加了其附加价值。

2010年，我们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全资建设新厂房，开辟了属于元大自己的创新

之路。通过不断工艺改良和科技创新，我们对产品进行全面升级，使免疫球蛋白(IgG)含量达到15%—60%，生物活性达到80%以上，并荣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2016年随着《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牛初乳被归纳到营养类食品中，再加上牛初乳的功效得到认可，其发展也越来越迅速。2017—2023年间，我们连续三次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随着公司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达到提升，为方便统一运营管理，2020年7月，我们在汉南区湘口街银莲湖农场建设集研发、生产、销售、仓储、物流为一体的工业产业园。产业园配备完善的检测中心，可对采购的原辅料、中间半成品、成品进行全项检验，保证出厂产品合格率。如今，我们的牛初乳冻干粉市场份额稳居亚洲第二。

有人问我为什么二十年如一日专注牛初乳产业，我想起内蒙牧民的话：“最好的奶要留给最需要的人。”这份对自然的敬畏、对健康的守护、对土地的回报，正是我始终坚持的动力源泉。

聚焦三农问题，建言现代农业发展

我出生于江夏农村，也始终放不下农村。成为民革党员、政协委员后，更有了“为农代言”的责任。我积极深入农村调研，倾听农民心声，围绕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

2021年我在湘口片区调研时，有菜农反映因为缺少冷链设备，农产品在运输途中变质，损失惨重。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湘口片区位于武汉最西边，靠近仙桃，主要以基础农业为主，甜玉米、西瓜、草鱼等特色农产品声名远扬。但由于科技含量不高，

缺少龙头牵引，竞争力不强，经济发展滞后。为此我撰写《关于在武汉经济开发区（汉南区）湘口街建设预制菜生产线及万吨级冷库的建议》。引入预制菜生产线不仅可以点燃片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还能解决当地农产品的转化，通过深加工环节将农户养殖、种植的农产品转换成食品供给消费者，带动与其预制菜生产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和周边产业全面发展，为区域经济注入活力。

以单品“酸菜鱼”为例：从收购周边养鱼场和农户的新鲜活鱼，经过宰杀、取片、去骨、调味后制作成酸菜鱼，然后零下40℃急冻、入库，并通过冷链物流配送至全国各地，单条生产线就能带动上千人的就业，项目投产后几十条生产线全开，则可带动上万人的就业。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孩子不用留守，老人不用独自在村，农村的稳定性就增强了，经济也盘活了。

湖北是鳜鱼养殖大省，产量全国第二，却长期面临“有产品无品牌”的困境。2023年，我走访汉南区鳜鱼养殖基地时，养殖户老刘苦恼地说：“我们的鱼和安徽的品质一样好，但人家‘徽州臭鳜鱼’能卖到100多元一斤，我们只能卖几十元。”

武汉市农产品素来有大品类、小品牌的特点，目前在水产养殖里，稍有名气的就是“梁子湖”螃蟹、“鄂州武昌鱼”，但较之于全国有名的“徽州臭鳜鱼”，我市鳜鱼品牌效应明显偏弱。酒香也怕巷子深，区域品牌不足也造成了鳜鱼“养殖在湖北，品牌在安徽”的窘境。

虽然鳜鱼养殖场户众多，但大多以家庭农场为主，规模化生产企业少，大多数养殖者没有品牌意识，品牌建设及运营能力较



“同心聚力，微光聚爱”困境儿童帮扶活动现场

差，一些公司、合作社的品牌仅仅是注册了商标，然而并未赋予品牌实质性内涵，品牌的知名度、诚信度、美誉度较为有限，鳜鱼的加工尚处于探索阶段，未实现规模化生产。

经过深入调研，我写出《关于打造具有荆楚特色的鳜鱼农产品品牌的建议》，提出“加快鳜鱼相关产业技术的研发及推广、从‘农头’到‘工尾’，积极推动鳜鱼产业融合发展、打造连锁经济，实现‘空中+地面’全覆盖”等方案。建议得到市农业局采纳，目前正推动建立“武汉鳜鱼”地理标志品牌。老刘现在办起了鳜鱼农家乐，游客可以直接垂钓品尝鲜鱼，他说：“聂委员，品牌真的就是竞争力啊！”

针对荆楚农耕文化缺失断层问题，我撰写了《关于加强荆楚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建议》。针对农村产业分散、科技含量低的问题，我撰写《关于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打造车谷农博园建设生态文旅产业创新小镇的建议》，为政府科学决策现代生态农业发展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建议参考。

这些事让我明白：民革党员、政协委员

不只是开开会、举举手，更要为大家跑腿、为大家说话。

凝聚爱心力量，践行社会责任

作为民革党员和企业家，我深知肩上的责任不仅仅是经营好企业，更要发挥优势回馈社会。企业的价值不仅在于创造利润，更在于为社会带来积极改变。每一次调研、每一份提案、每一个公益项目，都是我践行这一信念的实际行动。

2022 年以全市统一战线“同心汇”社会服务品牌活动为契机，申报了“同心聚力，微光聚爱”困境儿童帮扶项目，通过多种形式帮助困境儿童解决思想、学习、心理、生活等多方面问题。截至目前已经开展了“点亮微心愿”启动仪式、认领困境儿童微心愿、暑期留守儿童素质教育公益课和守护成长爱心牛奶捐赠等活动。2023 年，我又将

“同心聚力，微光聚爱”困境儿童帮扶项目扩展到高中，资助经开区汉阳三中高一年级三个品学兼优的贫困生，直至她们完成高中学业。

我带领民革党员深入调研农村乡镇企业，了解乡镇企业发展痛点及制约因素，并在市区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产品加工产业协会”，目前已吸纳 32 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协会的成立为经开区乡镇企业构建了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提供政策咨询、市场信息、技术援助、科技培训等全方位的服务，在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过程中发挥助手作用，成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倡议。为积极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



“一带一路”湖北—中亚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组合影

“一带一路”湖北—中亚国际科技合作项目，2023 年 10 月，我远赴哈萨克斯坦交流考察，受到了哈萨克斯坦阿拜州农业部门负责人和“阿塔梅肯”企业家协会秘书长的热情接待，我们就牛初乳科技合作项目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中亚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先行示范区。我们开展牛初乳科技合作项目能够架起湖北与中亚农业合作的桥梁，为整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为“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贡献力量。

回顾这些年，我在本职工作上专注牛初乳研发销售，做到亚洲第二；在履职道路上聚焦三农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在公益事业中传递温暖爱心，帮扶弱势群体。这三条道路，汇聚成我作为民革党员的初心使命——为农代言，为民服务。

未来，我将继续深耕农业领域，建真言、献实策、办实事。风雨同舟路，我与民革、与这片土地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鄂楚风骚逐江流（上）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鄂州元素

◇ 邱 风

鄂州，这座屹立于长江中游的历史古城，自公元前879年楚君熊渠封次子熊红为鄂王并筑鄂王城起，便开启了辉煌的历史篇章。诸多历史名人于此留下足迹，在长江之畔书写传奇。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宏大框架中，鄂州的历史人文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犹如一颗璀璨明珠，熠熠生辉。他们的故事与长江的浪涛交织，共同铸就了鄂州独特的人文气质。

帝王将相：江畔定乾坤

熊红：长江之滨筑王城

西周夷王七年（前879年），楚君之子熊红受封于长江之滨的战略要地——鄂邑，在此筑鄂王城，开启了鄂州作为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的历史篇章。

鄂王城作为楚国早期核心城池，选址于长江与梁子湖水系交汇处，兼具水运之便与军事之利。城池布局严谨，城墙高大坚固，城内宫殿、作坊、民居错落有致，是当时长江流域规模宏大的城邑。它不仅承载熊红的统治权威，更成为楚国东进扩张的战略支点，见证楚国早期的崛起与辉煌，对鄂州城市起源和发展影响深远，成为鄂州城市文明的重要源头。

在随后岁月里，鄂王城作为楚国国都历经六世十多位楚王，持续二百余年。楚文王初立之年，虽迁都至郢（今荆州古城），但鄂王城仍作为楚国别都和贵族封邑，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屈原：鄂渚上的千年回响

战国时期伟大诗人、楚国政治家屈原，以其《离骚》被誉为爱国主义与浪漫主义文

学鼻祖。在《九章·涉江》中，有“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之名句，“鄂渚”，即今鄂州梁子湖水系。相传屈原被放逐江南，本欲至鄂王城面对先祖熊红哭诉衷肠，途经鄂渚泽林村时，见当地瘟疫流行，便留下传授草药避疫之法，为百姓解忧。当他投江的消息传至泽林村，已过十日，百姓遂将五月十五定为大端午节，民间盛行“茅船会”，以旱地行舟的特殊方式祭祀这位爱国诗人。2014年，鄂州市泽林旱龙舟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孙权：东吴王朝的奠基之主

在长江之畔的历史长卷中，孙权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公元221年，为谋霸业，孙权将治所自公安迁至鄂县，并以“以武而昌”之意，改鄂县为武昌，自此开启这座城池与东吴政权的传奇篇章。

次年，孙权在武昌称吴王。凭借敏锐的战略眼光，他意识到长江天险的重要性，大力发展水军，训练出强大水上作战力量。武昌不仅成为东吴对抗曹魏与蜀汉的前沿阵地，也推动长江中游地区的开发与繁荣。

公元229年，孙权于武昌正式称帝，建立吴国。武昌作为东吴第一个国都，见证东吴政权的高光时刻。统治期间，他对内推行屯田制，兴修水利，促进经济；对外与蜀汉联盟，多次成功抵御曹魏南侵，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孙权亲自策划和督建首都武昌，城内宫殿巍峨，城郊屯田兴盛，商贸频繁，尽显繁华。古武昌（今鄂州）留下诸多历史遗迹：吴王城遗址诉说当年辉煌；凤凰台相传是孙权称帝时凤凰翔集之地，成为千古佳话；寒溪附近的吴王散花滩、广宴楼，据说是孙权犒赏将士之地，寄托人们对那段风云岁月的追思；还有孙权在西山留下的避暑宫、试剑

石、洗剑池等遗迹，体现鄂州作为东吴都城的繁华与重要战略地位。

陶侃：治水安民留遗泽

东晋名将陶侃于咸和五年（330年）任武昌太守，书写了一段治水安民、励精图治的史诗。这位出身寒门的将领，在出任武昌太守后，面对洋澜湖（古称南湖、长湖）水患频发的困境，亲自踏勘地形，创造性采用“分流筑堰”法：在湖东南修筑蓄水堤坝，设闸引江水调节水位；在西北开凿“陶公渠”，引湖水灌溉良田，同时从琅琊湖引进鱼苗发展养殖，让百姓“靠水吃水”。改造后的洋澜湖，变季节性湖泊为稳定水源，“夏蓄洪、冬蓄鱼”，湖畔“粳稻连云，莲藕盈舱”，百姓感念称为“陶塘”。

“陶侃问柳”的廉政佳话也传诵至今。为巩固江防和改善环境，他下令在城内广植柳树形成屏障。某日发现一部属将公柳私移自家门前，当即厉声质问：“此乃武昌西门前官柳，何得盗栽？”部属惶恐认罪，立即移回原处，彰显其“官物一丝不取”的为政准则。这些“武昌官柳”后成为六朝名胜。离任时，他将所有军资造册封存移交，连竹头木屑都登记在案，只留下洋澜湖畔“官柳依依，渔歌阵阵”的盛景。苏轼后来凭吊时慨叹“武昌官柳知谁栽”，正是对这位江畔清官最深致敬。

车胤：湖畔江边显忠烈

以“囊萤夜读”闻名的晋代名臣车胤，又名武子，曾任荆州别驾（约373年），负责长江航运事务。鄂州（时称武昌）作为长江中游军事重镇，是其巡视必经之地，因此对武昌印象深刻。车胤晚年任吏部尚书时，因反对乱臣世子专权乱政，遭政治迫害。约公元400年，被迫离建康，沿长江避难至武昌，隐居洪道乡嘉藕湖畔。此地当时为荒僻

水泽，因车胤筑屋定居，被乡民称为“车公浦”。公元401年，贼臣派人追至武昌，逼车胤自尽，死后葬于嘉藕湖畔。百姓为纪念这位清廉刚直的名臣，将嘉藕湖更名为“车湖”，其避居聚落得名“车湖村”（今属鄂州市临空经济区燕矶镇）。《晋书》载“车胤忠烈”。其清廉刚直之风，与陶侃、庾亮等治江名臣一脉相承，共同构成晋代长江治理文脉的重要篇章。

文人墨客：诗酒伴江涛

李白：南楼风月共长江

一个月明如洗的夜晚，李白与友人登武昌城内南楼。南楼又名更楼、古楼，因东晋名将庾亮镇守武昌时携王羲之等登楼赏江景，亦被称为庾亮楼、庾楼。李白在南楼把酒临窗，遥望长江如练，白帆点点，渔火明灭，渔歌悠远，不觉触动万千感慨，当场挥毫写下：“清景南楼夜，风流在武昌。庾公爱秋月，乘兴坐胡床。”借庾亮南楼赏月典故，既描绘南楼夜色清雅，又暗含对武昌人文风流的赞叹。自此，南楼因李白诗篇声名远扬，成为文人墨客心中的诗意图标，而长江之畔的武昌，也被永远镌刻在诗仙的浪漫笔触之中。

元结：西山坐见大江水

唐代文人元结选择隐居鄂州西山，自号“漫郎”，于长江之畔的清幽山林间寻觅心灵归处。他远离尘嚣，以山水为友，将自然感悟倾注诗文。在西山，长江波涛、山间草木皆成创作灵感，如《招孟武昌》中：“湖尽到谷口，单船近阶墀。湖中更何好，坐见大江水。”以质朴文风描绘西山景致与江边静谧生活，字里行间透出淡泊心境与自然热爱。元结的隐居与创作，为鄂州西山增添深

厚人文底蕴，让这片山水成为后世文人追慕的精神栖息地。

苏轼：长江风物入诗魂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春，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初来乍到的他，在落寞孤寂中于江边迎来第一位特殊访客——王齐万。王齐万来自蜀地，与兄王齐愈寓居黄州对岸的武昌县刘郎洑（今鄂州市燕矶镇车湖村），闻苏轼贬谪至此，特来探望。他乡遇故知，苏轼满心感念，写下《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长诗。“与君饮酒细论文，酒酣访古江之瀆。仲谋公瑾不须吊，一酌波神英烈君。”诗结尾情感升华：作者与王氏约定寒食节在武昌相聚，畅饮酒谈诗文，趁酒兴到江边探古寻踪。在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土地上，有孙权雄踞江东，建立东吴帝国；有周瑜羽扇纶巾，指挥赤壁之战；有伍子胥渡江奔吴，辅佐吴王阖闾成就霸业。在对江东英雄的喟叹中，作者将历史沧桑与个人境遇融为一体。

此后，苏轼在谪居黄州的四年里，与江南亲友过往频繁，留下许多不朽诗篇。元丰七年（1084年），他量移汝州时，特到武昌辞别亲友，深情写下《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诗中，长江清风明月、武昌山的静谧与黄州鼓角的雄浑交织，将四年孤寂与豁达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诗尾：“我记江边枯柳树，未死相逢真识面。他年一叶溯江来，还吹此曲相迎饯。”抒发对离别江南的不舍与期盼再见的深深留恋。

多年后的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见一幅大江题材山水画，不禁勾起对江南武昌岁月的深情回忆，作《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题诗。从初到鄂州借诗感怀，到离别后以画寄情，苏轼与长江、与鄂州的故事，

在诗篇中永恒流传。长江的波澜壮阔，永远滋养他的诗魂，而他的诗歌，也为长江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庭坚：松涛江声化墨韵

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命运的洪流将黄庭坚卷入人生低谷，他被贬至鄂州，开始一段与西山紧密相连的时光。

九月十二日夜，黄庭坚与友人潘邠老、李文举、陈元矩等从樊口上岸，踏入西山怀抱。彼时，距恩师苏轼离世刚好一周年。万籁俱寂之夜，松风阵阵更显悲怆，仿佛苏轼的低语，又似命运的叹息，触动黄庭坚心弦。他想起与东坡先生相处的点滴，那些诗词唱和、人生起落中相互扶持的日子，如今化作深深思念。他当即挥毫泼墨，笔走龙蛇，一首名为《武昌松风阁》的惊世诗帖由此诞生。

“依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箕斗插屋椽。我来名之意适然。老松魁梧数百年，斧斤所赦今参天。”

从松风阁的位置，到夜宿情景，从景到人，从山水到禅理，抒发对东坡先生的怀念，喟叹自己的人生思考。一句句诗，是他内心的倾诉；一个个字，是他情感的寄托。

此后，鄂州西山上这座未名阁便被命名为松风阁，它与松风、江声一起，成为千古绝唱的见证者。而《武昌松风阁》诗帖，也因独特艺术魅力，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九行书”，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丁鹤年：南湖江渚遗风流

元代著名诗人丁鹤年，历经世事变迁后隐居鄂州西山下的南湖（今洋澜湖），在长江之滨度过静谧而富有诗意的时光。每日面对奔腾江水，眺望西山葱郁，他的诗篇充满人生感慨与自然热爱。丁鹤年诗文兼具韵律之美与情感深度，或怀古伤今，或赞美山水，如《樊口隐居》：“万里云霄敛翼回，挂冠

高卧大江隈。春深门巷先生柳，雪后园林处士梅。”将自身情感与鄂州山水人文交融，表现超凡脱俗的气节与境界。他在古武昌的创作，丰富了鄂州的文化宝库。

张裕钊：长江赤子翰墨情

在晚清书坛，张裕钊以独特“南宫体”名震四海。这位书法大家，1823年冬生于鄂州长岭镇。少年时，他常在江边私塾读书，江水奔涌与朗朗书声交织，砚中墨汁倒映江上帆影，这种环境为他日后书法创作埋下诗意图种子。

1850年，张裕钊考取国子监学正，授内阁中书，成为“曾门四仕”之一，被曾国藩称“门徒中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功成名就后，他虽辗转多地讲学授艺，但始终心系家乡。多次回鄂州，在西山古寺、寒溪书院等地挥毫泼墨，留下珍贵墨宝。其书法以隶书专长，笔力刚健中蕴含秀逸，恰似长江水奔涌时的磅礴与婉转。他既是大书法家，亦是诗人，赞颂家乡的诗作情挚意切，晓畅动人，如《日日》前四句：“日日庭前数暮鸦，年年江上听秋茄。山枫落后时过寺，篱菊开时最忆家。”张裕钊与鄂州，不仅是地域归属，更是艺术与精神的血脉相连，其文脉传奇在鄂州大地上代代流传。

邱风，原名邱保华，鄂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退休干部；现为鄂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五老宣讲团”成员，鄂州市作协副主席

汉阳江风暖 医者仁心长

◇ 熊 涛（口述） 章旷怡（整理）

人物名片：熊涛，市政协委员、汉阳区政协常委，农工党市委常委、汉阳区工委主委，武汉市第五医院院长。

我常去我们五医院的白求恩纪念馆，驻足在那些泛黄的图片前，上面记录着1938年白求恩大夫曾在这里救治伤员。他使用的手术器械简陋得令人心酸，有些甚至是自制的，但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早已穿越时空，烙印进五医院人的血脉里。无论是高原寒夜奔走在急救路上，在社区医院为提升同仁待遇奔走呼号，还是在疫情最凶险时坚守一线，支撑我的，一直是这朴素的八个字。

雪域高原领悟医者本心

1997年8月，我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来到武汉市第五医院神经科任住院医师，开启了行医之路。



武汉市第五医院的白求恩雕塑

2013年，我被省卫生厅选入援藏医疗队，赴西藏山南地区人民医院工作半年。在决定援藏前，我曾听闻藏区条件艰苦，内地去的人高原反应大，工作也很辛苦。内心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咬着牙坚持报名。

当年6月，作为湖北省选派的医疗援藏



在西藏山南医院看望病人

队员，我和其他四位同事一同踏上了山南的土地。没想到刚到西藏，高原反应就毫不留情地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头痛欲裂像要炸开，心慌气短，夜里总被缺氧活活憋醒。队员们只能小声说话交流、缓慢行走，大家相互鼓励支持，一起度过了最初那段难熬的适应期。

我被分配到山南地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独特的高原气候使脑血管疾病成为威胁当地人民生命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但当地神经专科力量比较薄弱。查房时，当一些患者和家属得知我是内地来的医生，那充满纯粹信任的目光，让我深感责任重大。

白天是紧张的临床工作，我主动承担起科室二线值班和门诊重任，无论多晚、多冷，只要医院有急危重症呼叫，我都随叫随到。平均每月诊治神经科住院病人30多例、门诊病人有100多例，其中危重病人就有20余例。

记得一个寒冷的深夜，急诊送来一位

意识不清的患者。影像科同事初看CT认为无明显异常，但凭借多年神经内科工作的经验和直觉，结合患者体征，我高度怀疑是极其凶险的脑干出血。顶着压力，我坚持立即复查CT，并与影像科医生反复沟通，诚恳表达我的疑虑。最终复查结果证实了我的判断，患者正是致命的脑干出血。考虑到患者家境困难，我们立刻多方协调，为他争取减免了复查费用。

这件事为援藏医疗队在当地医院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更赢得了藏族同事们的尊重。事后，我们一起复盘整个诊疗思维过程，那份通过专业碰撞带来的提升与相互认同，至今想来，心头仍涌动着暖流。

为了尽快带出一批当地神经内科专科医生，我和当地医院领导协商确定了工作的主攻方向：尽快加强当地人员基础知识培训、完善急危重症病人抢救步骤流程、帮助他们掌握神经科疾病的规范治疗以及如何使用先进医疗设备等。随后，我率先在科室及院内开展大讲课，月均大讲课4次，科室小讲课随时讲。每次讲座时，屋子总是坐得满满的，他们真诚渴望有这样的实际培训机会，希望能学到更多更好更先进的医疗技术。

在这里，“被需要”是一种沉甸甸的幸福，它超越了身体的疲惫和高原的孤寂。半年的援藏时光飞逝，离开那天，回望这片赋予我精神高原的土地，我知道，这朵盛开的格桑花，已深深烙印在我的血脉里。

社区卫生中心的千个日夜

带着高原赋予的坚韧与感悟，2015年，一纸调令让我踏入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战

场”——担任二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这次角色的转换，让我前所未有地触摸到中国医疗体系的基层脉搏。

之前在五医院工作时，我更多关注的是疾病的诊疗技术本身，来到社区，我才真切感受到基层的困境。一次与社区一位高年资医师交谈，他默默地将一张工资条推到我面前，看着那上面印着的数字，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油然而生。这点微薄的收入，如何支撑一位拥有专业知识和多年经验的医生的尊严与体面生活？更令人揪心的是人才的持续流失。那些我们辛苦培养出来的全科医生，因为待遇低、发展平台窄、看不到职业前景，一个个黯然离去，去了民营医院或者干脆转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临人才匮乏、设施设备陈旧、政策支撑不足的重重压力。政府的“兜底”功能尚未完全到位，大量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如健康档案、慢病随访、免费体检等）都是无偿提供，社区卫生中心的运营十分艰难。老百姓用脚投票，对基层能力普遍缺乏信任，大病小情依然涌向大医院。社区医院“人民健康守门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一条深深的鸿沟。

身为一名医生，我痛心于同仁的困境；作为一名农工党党员和政协委员，我更深感肩上责任的沉重。从2015到2017年，连续三年，我的政协提案都紧紧围绕一个核心：夯实基层医疗根基，筑牢健康第一道防线。

我以亲身经历为蓝本，深入调研剖析问题，提出符合区域实际情况的措施建言：政府需要发挥民生兜底作用，给予基层医护人员一定的补贴。这并非空泛的口号，是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我进行详实的数据测算，是无数次目睹基层优秀医疗人才流失的无奈与焦虑。

推动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初的提案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回应寥寥，甚至有关部门也表达了财政压力过大的担忧。但我没有放弃。在政协会议上、在调研座谈中，我坚持摆事实、讲数据，用社区工作的真实案例说话。这份锲而不舍的呼吁，这份基于一线实践的执着，终于得到了回响。

2018年，汉阳区委区政府采纳了建议并落地政策，给予社区医院全科医生和护士每年一定的补贴。虽然彼时我已因工作调动离开了社区卫生中心主任的岗位，未能享受政策红利，但得知这一政策惠及了昔日的同仁，那份由衷的欣慰感远超过任何个人得失。这三年深入基层的锻炼，让我在苦日子里嚼出了甜，基层的冷暖，从此更深深地刻在了我心里。

推进汉阳医联体建设

2018年，带着社区沉淀的体温与对基层医疗体系的深刻理解，我回到了武汉市第五医院，先后担任神经内科主任、副院长。此时，医院正积极响应国家医改号召，大力推进医联体建设。

汉阳区虽早有医联体架构，由五医院牵头多家社区卫生中心，但运行中医院侧重业务指导和技术帮扶，卫健委负责行政管理和部分资源调配，权责边界不清导致协同效率低下，优质医疗资源难以真正下沉到基层社区，老百姓的获得感不强。社区卫生中心缺人、缺技术、缺信任，大医院依然人满为患。

在汉阳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下，我们开始大胆探索重构之路，经过深入调研和反复论证，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方案逐渐成熟。2024年5月，8家政府主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交给五医院管理。在



开展“农工助医”活动

保持卫生中心机构公益性质、独立法人身份不变的前提下，其“人、财、物、事、管、绩”由五医院统一管理。五医院“上接”同济医院，“下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形成1+2+N的三级医联体布局，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到基层。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五医院精细化的管理体系全方位植入社区。医院27个职能部门（医务、护理、院感、质控、药事、设备、信息、后勤、保卫等）全面对接并直管社区相应工作，让大医院的标准、流程、规范，成为社区卫生中心工作的标尺。

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人才柔性流动机制和同质化培训体系，来自总院的26个科室专家团队常态化下沉社区，开展坐诊、带教、查房工作；同时，社区医护人员则定期到总院进修学习。这一举措显著提高了社区医生的专业能力，也增强了他们对居民疾病诊治的信心。

由此带来的变化在社区愈发常见：当居民突发胸痛时，社区全科医生不再手足无

措，而是第一时间进行规范处置、完成心电图检查，并通过绿色通道直接联系五医院心内科值班专家。这种基于能力提升和制度保障的高效协同与信任，正是医防融合、资源下沉的生动体现。

成效是最好的证明。汉阳区社区医院门诊量显著攀升，位居武汉各区之首。像五里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日门诊量高峰时能达到600人次。可以说，汉阳区初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分级诊疗“双向奔赴”。

作为政协委员，我从未停止为医联体鼓与呼。2023年，我提交的《深入推进医联体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共享》提案被选为汉阳区政协大会发言，受到广泛关注。

此后，我又稍作修改后提交市政协，该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市政协督办组高度重视，相关职能部门频繁与我联系沟通。尤其让我感到振奋的是，我们汉阳区紧密型医联体建设的经验，作为武汉市基层医改的亮点，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第二届大会上进行了交流。

医生与政协委员，看似两种角色，实则同根同源。前者守护个体生命的长度，后者拓展群体健康的宽度。在汉阳树五百年的年轮面前，个人的作为或许微小。但若能以专业为针、以建言为线，为这片土地织就一张更牢固的健康防护网，让优质医疗如汉阳江风，吹入寻常巷陌，便不负白求恩雕像前那束不灭的灯光，亦不负这身白衣与那份沉甸甸的履职承诺。

书香致远，做幸福阅读的点灯人

◇ 王 婷（口述） 银 华（整理）

人物名片：王婷，江夏区政协常委，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人，武汉聚贤书局创始人。

人和书之间是讲缘分的，我的缘分始于我父亲。小时候在陕西，晚上没什么娱乐，父亲就给我们姊妹几个讲睡前故事。不是什么王子公主，而是一些接地气的民间故事。那些鲜活的人物和道理，就这么一字一句地种在我心里。从那时起，我就对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习惯一直影响着我，使我后来成为一名阅读推广者。

我的阅读推广之路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坚持做阅读推广，是因为阅读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滋养了

我。它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我日常生活里的阳光和空气。

记得2013年孩子出生后，我开始系统学习育儿知识。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短视频可以学，全靠自己看书，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孙瑞雪的《捕捉儿童敏感期》，这些书我都反复研读。我把书里的方法用到自己孩子身上，实践、总结，居然还真摸出些门道。因为爱分享，我开始尝试着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分享在网络上，慢慢组建了近千人的妈妈平台。周围的妈妈们也开始来找我咨询，怎么给孩子选书，怎么陪孩子阅读。这让我发现，原来我这点爱好和经验，是真的能帮到人的。

2017年4月，我组建了妈妈创业团队，专职工作人员6名，创办了701亲子成长中心，设立了701童书馆。当时在江夏区，还



2025年1月，王婷在聚贤书局发起“她力量”女性成长演讲活动

没有人做民营的儿童图书馆，一切都是摸索着来。书，是我们自己一本本挑、一本本买的；活动，是我们自己一场场设计、一场场讲的。我们做幼儿故事会、小学生读书会，后来还发展到绘本电影赏析、绘本戏剧表演等多种形式。尽管起步艰难，但凭借着一份热爱和坚持，701童书馆逐渐成为江夏区唯一一家专注儿童阅读推广的民营绘本馆，并成为区图书馆分馆，免费对外开放借阅。

因为做的都是跟书籍有关的事，正能量、有温度，区妇联找到我，支持成立了玲珑亲子成长协会。这让我有机会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去看待妇女的发展、儿童的成长。2018年，我当选为区妇联兼职副主席，这个身份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开始思考如何为更多女性发声。

最让我珍视的记忆之一，是站在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的那天。那是我第一次受邀在如此正式的场合分享一本书——我钟爱的《夜莺》。这本书讲述了二战中女性如何在极端环境下坚守信念、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书中人物的勇气深深震撼过我，我也希望将这份力量传递出去。

那天，我特意选择了一件香云纱旗袍，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件旗袍。我精心整理了妆容，将头发挽起，只想以最郑重其事的状态，面对台下那些信任和期待的目光。当工作人员引导我走上舞台时，聚光灯有些灼热，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但当我开口，讲述《夜莺》中伊莎贝尔用假证件穿越封锁线、姐姐维安妮在后方守护犹太儿童的那些段落时，紧张感渐渐被一种分享的喜悦所取代。记得讲到动情处，台下寂静无声，许多观众眼含泪光。

那次经历像一道分水岭。从那以后，我变得更加自信，开始尝试策划更多形式的阅读活动，主持、导演、甚至亲自参与演出。每一次站上舞台，我都会想起那个穿旗袍的自己，以及《夜莺》带给我的启示：真正的勇气，是怀着恐惧依然选择前行；真正的推广，是用生命影响生命。

让书局成为一片森林

一个人读书，是点亮自己；一群人读书，就能彼此照亮。创办701童书馆后，我最大的快乐不再是一个人沉浸书海，而是看到阅读如何像水一样，流淌进更多人的生活。

我们童书馆免费开放，来的孩子越来越多。很多家长，尤其是妈妈，一开始只是陪孩子来，后来自己也渐渐被书吸引。我决定专门为妈妈们开设读书会，每月共读一本家庭教育或女性成长方面的书籍。在花香、茶香和书香的氛围里，妈妈们探讨交流，互相鼓励，共同成长。我看到太多妈妈在这里找到了力量。

正是这些触动，让我不满足于只守着

一个馆。在区妇联的支持下，我们组建了 100 人的亲子阅读巾帼志愿服务队，定向培育了 20 多名“故事妈妈”志愿者。这些妈妈们利用闲暇时间，走进社区、幼儿园、图书馆，开展儿童阅读活动。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带她们去省图培训时，她们既紧张又兴奋的样子。后来看到她们在孩子们面前自信地讲故事，那种蜕变让人欣慰。

我们的脚步还走到了更远的地方。2018 年，在武汉市民政局、妇联的支持下，我们把阅读活动送到了偏远地区的农村留守儿童学校。一年时间里，我们去了 10 多所农村学校，为超过 1000 名孩子带去了故事和书籍。我相信阅读就像一盏灯，或许不能立刻改变什么，但能给孩子们的心灵带来光和暖，让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701 童书馆关闭。2023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重新创办了聚贤书局。书局坐落在江夏汤逊湖人才公园之畔，湖畔的室外亲水花园风景优美，错落有致的绿植、花束则将室内装点得诗意盎然，宽大的玻璃窗将噪声隔开，为爱看书的人们提供一个舒适的阅读港湾。

聚贤书局不仅延续了 701 的阅读推广使命，更拓展了文化服务功能。我们打造“聚贤读书会”“聚贤儿童读书会”“聚贤养心沙龙”等品牌活动，满足不同读者需求。结合江夏“汤逊湖人才十条”“才聚江夏”等政策，书局发挥人才会客厅功能，打造人才驿站，为人才文化生活提供优质服务。我们还探索儿童课后、节假日阅读托育服务，响应国家发展多种托育模式的号召。



聚贤书局

2023 年上半年，江夏区政协在聚贤书局授牌成立“王婷委员工作室”。我们又结合书局空间布局和读者类型，开发线上工作室平台。群众只需扫码，就能了解工作室职能、品牌和以往活动成果，也可通过平台反映诉求、表达困难。我会第一时间查看并联系群众，协助解决问题。现书局已被列为武汉市城市书房，并荣获 2024 年武汉市最受市民喜爱的阅读空间、江夏区十佳职工书屋等荣誉称号。

我相信，一个城市，只要还有书店亮着灯，还有人愿意走进来安静地读一本书，这个世界就总不会太糟糕。就像聚贤书局墙上写的那句话：“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

传递阅读的力量

作为政协委员，我始终提醒自己，不仅要用心推广阅读，更要把履职融入日常。这几年，我积极参加政协和统战部组织的各类学习，从常委会、两会到党外人士座谈，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到场。这些学习让我跳出自己的小圈子，真正去理解政策、思考

发展。我还做过区纪委的营商环境监督员，跟着项目推进会，一点点了解企业落地的真实过程。这些经历让我发现，民主监督不是走形式，而是实打实地为企业、为百姓解决困难。

在政协这个平台上，我尝试把“书香味”和“履职经”结合。我写读书心得、讲履职故事，也有幸在市级交流中代表区里发言。最让我开心的是，能够协助打造“书香政协”的品牌活动。我们组织共读、开展讲书，让委员们在书声中凝聚共识。后来，聚贤书局成了大家常来的地方，农工党、民进等好几个委组都来这里办读书会。窗外汤逊湖波光粼粼，室内翻书声静静地响起，氛围特别好。

立足聚贤书局，我主动倾听民声，撰写了社情民意信息《关于建设江夏书香智慧校园的建议》，该建议得到立案，并推动实际工作。我们联合区文旅局和多家公共图书馆，走进江夏区多所乡村学校，为孩子们送去图书，组织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依托政协平台，我实地走访调研，了解到乡村学校课外活动单一、学生积极性不高、困难儿童需帮扶、留守儿童需关爱和心理辅导等问题。随后我们成立“聚贤”志愿服务队，联合多家委组开展座谈会，商定以文化志愿服务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方式，链接政协委员、高校大学生、社会贤达等作为志愿者，走进不同学校开展针对性课外活动，并进行困难儿童物资帮助和留守儿童心理辅导。

我们联合其他委组开展一线协商·以文化志愿服务助力乡村儿童健康成长行动，至今已联合 10 多个委组 60 多名政协委员，



2024 年 5 月，王婷带领聚贤志愿服务队走进乡村小学开展公益活动

300 多名社会贤达、高校大学生组成的志愿者团队，走进 8 所乡村学校，开展近百场课间活动，捐赠物资 10 万余元。在捐赠物资的同时，我们也在陪伴乡村儿童成长。

围绕“丰富乡村课外活动，促进乡村儿童身心健康”课题，我先后深入江夏区南部乡村街道、金口街道等地开展 6 次调研。通过走进学校、走访家庭，与老师、家长和孩子交流，我深切体会到乡村儿童课外生活单一、心理关爱资源不足等困境。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我撰写完成调研报告《丰富乡村儿童课外活动 促进乡村儿童身心健康》，系统提出整合社会资源、拓展活动形式、加强志愿者服务等建议，旨在为乡村孩子营造更健康、温暖的成长环境。

2022 至 2023 年，我连续两年被评为区优秀政协委员，所在的新联会组也被评为优秀履职委组。这份荣誉让我充满对政协平台的感恩。未来，聚贤书局的灯会一直亮在汤逊湖畔，真正成为市民的精神家园。

踏准时代的节拍，做有温度的装修人

◇ 杨道成

人物名片：杨道成，武汉襄阳商会副会长，一米居装饰（公装）创始人，家翻新装饰（家装）创始人，武汉科技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武汉校友会副会长。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幸运的一代，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改革春潮、互联网革命和城镇化进程共同塑造的时代。它慷慨地赐予每个人改变命运的可能，却也残酷地淘汰那些停滞不前的观望者。

我很庆幸，自己不仅是这个宏大时代的见证者，更是一个全力以赴的参与者。从鄂西北的乡村走到武汉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从一名苦学不辍的农村孩子到创立两家装饰企业，我的每一步，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是时代给了我机遇，而我，选择用汗水、真诚和坚持去回应它。

寒门学子的求学路

我是湖北南漳人，家里三兄弟，我是老大。小时候家里穷，爷爷是地主，父亲因

为成分问题参军没成功，只能务农，但脑袋灵活，农闲时就挑着货担走街串巷贩卖小商品，以此来补贴一家人的生计。在那个年代，读书是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我也分外努力。

2003年参加高考进入武汉科技大学，这也成了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在武科大我得到老师的很多帮助。

选专业时没人指导，随意选了工业设计，结果发现这个专业需要扎实的美术功底，而我这个农村孩子连最基本的素描都没学过。但我不服输，无非比别人多花些时间，大学里我拼命学习，在图书馆通宵达旦地研究3D建模软件，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既然手绘是短板，何不在电脑设计上寻求突破？在校期间我已经熟练掌握了12种设计软件。

2007年毕业，我进了一家很稳定的企業，干了没多久就觉得“一眼望到头”。我父亲爱折腾，我也遗传了这点，与其安稳穷一辈子，不如搏一把。

我回到武汉，大学老师是我在这座城市唯一的人脉，彼时正值中国互联网兴起，

老师建议我往这个方向发展。2008年我入职宏博软件当老师，教授软件课程。

在互联网浪潮中沉浮

2008下半年我接手了一家小型培训学校。恰逢电商野蛮发展期，在淘宝火起来以后，平面设计、网页设计、室内设计有很大的需求量，需要很多有基础、懂软件的人才。大学生在学校学到的软件技能是比较薄弱的，这就给了软件培训学校机会。

为顺应时代发展，我们教授的软件从办公自动化，到平面设计、网页设计、室内设计……涵盖了多个领域，记得教学生3D软件时，教材是全英文版，我自己先得谙熟于心才能教别人，只能晚上挤时间看书，厚厚的学习资料被我翻烂了，直至现在这个软件的参数材料都还印在我脑袋中。当时是下了死功夫的，课堂上学生随时提问，不可能再去翻书，必须应对自如。

培训让我赚到人生第一桶金，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培训逐渐涌现，这对线下培训构成了很大冲击，我便把培训这块业务全部交给合伙人打理，我自己从里面抽身，去探索新的领域。

2011年，我去北京加入了天下商机（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为中小企业（加盟连锁）做互联网推广的全国头部企业。那时候我才明白生意本质——“开一家店不赚钱，开一百家就赚钱”。那几年在公司的培养下，我接触了很多的项目，同时也接触了很多老板，我懂得了有人靠供应链整合赚钱，有人靠标准化复制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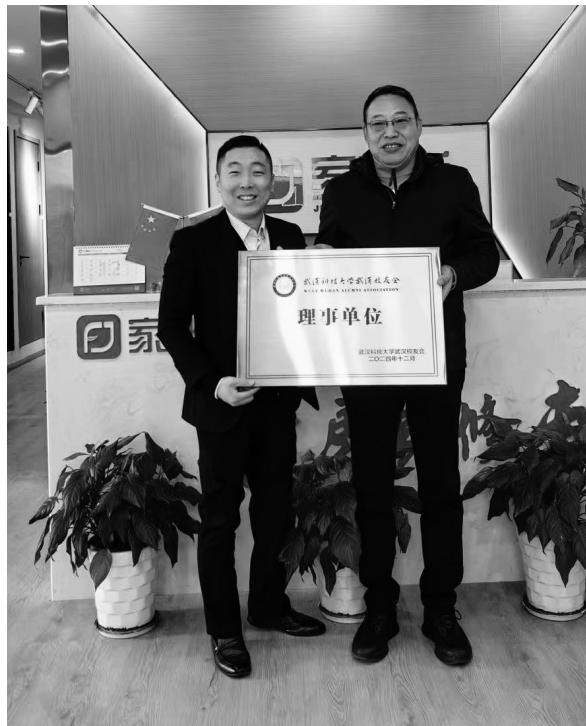
我们给客户策划项目：品牌故事、创始人故事、加盟模式、盈利模式、回本周期……一年后，回到武汉管理华中分公司，那个时

候带团队狼性十足，目标定了就想100种方法完成，从不问老板“怎么办”。恰逢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再次踩中风口，用互联网思维帮大学生客户做营销，帮他们的初创公司裂变推广。

2015年，华中分公司要全部搬回北京，彼时我已成家，面临选择：去北京、房价近10万1平；留武汉、创业做什么呢？

搭上房地产“黄金时代”的末班车

偶然间，我发现教过的学生在家居行业混得不错，心想：“他们能行，我当老师的应该也可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房子在装修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坑各种不顺，我想着跟我遇到相同情况的人肯定很多，那我何不入行来解决这些痛点！2016年2月1日，我注册“一米居装饰”，一头扎进装修行业，恰巧搭上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末班车。



成为武汉科技大学武汉校友会理事单位

第一个转折点是白沙洲一家3000平的健身房项目。客户找到我后，我分外珍惜，心想着“哪怕亏钱也要做好。”装修结束后客户很是满意。我悟出一个道理：装修不是拼价格，而是拼价值。装修是一件个性化很强的事，材质、工艺、定位不同造成价格的不同，很多装修公司自作聪明钻空子，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到最靠谱。此后“口碑大于利润”成为公司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遇到挑剔客户，我总说“客户没错”，宁可亏钱也不砸招牌。

第二个策略是“做有门槛的事”。结合在天下商机公司学到的生意经，我们建立标准化体系，整合设计、施工、供应链，专接连锁品牌订单。沃尔玛、湖北烟草、华为门店等陆续成为我的客户。

装修行业竞争惨烈，但我坚持一个原则：“共情工人和客户”，供应商、工人师傅都很信赖我，别的公司款都是月结，我们公司是周结，缺钱贷款我都会把钱发下去。

我是农村出来的，我很能理解他们，他们背后是一家老小，若无本事把公司做很大，就一定要把公司做稳！我相信做好人才能有好运，坚持“做好人、做好事”，时代总会给你机会。很多工人师傅跟我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目前很多人都在武汉买车买房安家了，这让我很自豪。

2020年，我成立“家翻新装饰”，专攻旧房改造。别人嫌麻烦不愿接的活，我们接；别人裁员35岁以上员工，我专招10年以上设计经验老设计师。现在回头看看，干



2023年，家翻新装饰团队团建

死诺基亚的不是手机同行，而是时代。新房装修市场萎缩，但旧房改造需求爆发，每年都会涌现大量房龄超过20年的旧房需要局部改造、整体翻新等，我们又踩对了点。

时代从不言语，却默默奖励那些认真对待它的人。我不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只是愿意在每一个浪潮来临之前，做好准备；在每一次选择面前，守住本心。装修看似是砖瓦水泥之事，实则关乎人的冷暖、家的温度、城市的变迁。我很感恩，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

未来，时代还会变，节奏还会加快，但我坚信：无论科技如何进步、模式如何更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手艺人的尊严、做事的诚意，永远不会过时。愿我们都能在时代的洪流中，找准自己的节拍，做一个有温度、有回响的人。

战时首都：抗战机关旧址

——武汉抗战遗迹巡礼之二

◇ 邓正兵 王 钢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开始进攻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军事统帅部留在武汉，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也驻留武汉，全国各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汇聚武汉，武汉成为战时首都和全国抗战中心。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新四军军部、新华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等机关旧址，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参政会、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等机关旧址，也反映了武汉抗战时期国民党表现出较积极的抗战姿态；“文协”“工合”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等机关旧址，则表现了武汉抗战时期文化界及社会各界的积极抗争。

“八办”旧址：中共在武汉的重要枢纽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937年10月经董必武筹备建立，先设在汉口安仁里一号，同年12月迁往汉口原日租界中街89号（今江岸区长春街57号）大石洋行。1944年，“八办”原址建筑在美军对日租界的轰炸中损毁。1977年，按原貌复建。1979年3月5日，由叶剑英题写馆名并正式开放。2013年，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2015年8月，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八办”是八路军在武汉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也是中共中央长江局所在处，是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

中共在华中地区开展抗日统战工作的重要枢纽。其主要职能包括：与国民党当局协调合作抗日、动员组织民众、筹措调配物资、传递情报信息、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并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重要联络点。

“八办”由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直接领导，推动了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为华中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关键作用。1938年10月，因武汉沦陷撤离。

新四军军部旧址：峥嵘岁月的起点

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位于江岸区胜利街332—352号（原日租界大和街26号），原为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汉口支店店长的私人宅邸。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和张

云逸在此召开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的第一个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军部下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1938年1月，军部移驻南昌，此处改为新四军驻汉办事处，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办相关事务。武汉沦陷后，建筑转为民居。1982年，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1992年，列为湖北省文保单位。2013年，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汉口新四军军部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见证了新四军的初创奇迹：完成南方8省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整编方案，将分散的6000余人整编成1.03万人的正规部队；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争取到军费；制定东进抗日战略，派遣先遣支队侦察敌情。

1990年，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项英的铜像，在其故乡江夏区熊廷弼公园竖立，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为铜像题



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字：“项英同志浩气长存”。2023年12月，项英铜像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

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旧址：湖北地方党建再次发力

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旧址，位于江岸区前进一路富源里。1937年9月，原红三十一军政委郭述申受党中央派遣来到武汉，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10月下旬，陶铸、钱瑛经周恩来、叶剑英营救出狱后来武汉，与郭述申一起组成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陶铸任副书记，钱瑛负责组织工作。省工委机关设于汉口府东一路富源里，现为民居。

董必武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直接领导湖北省工委的工作。12月25日，省工委改为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大力开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



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在富源里

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自1938年3月起，在富源里举办党员训练班，学习党章、党的建设、游击战争等。董必武主持党员轮训教育工作，并亲自授课。训练班先后举办5期，培养300余名党员，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武汉沦陷时，全省共有党员2800余人（包括湖北外县党员），一年中增加了3倍多。1938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迁往鄂西。

新华日报社旧址：中共在国统区的灯塔

1938年1月11日，几经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折，《新华日报》冲破禁区，在武汉正式创刊。社长潘梓年，经理熊瑾玎，总编辑先后由华岗、吴克坚担任。报社初设于汉口原日租界成忠街53号，后迁至民意一路大陆里4—9号。1983年4月，新华日报社旧址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

《新华日报》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综合性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新华日报》在武汉近10个月时间里，在指导南方各地中共组织建设及其活动，维护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各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日，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全国和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战真相的窗口。

1938年3月，为加强《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的发行，中共决定在汉口成立战时书报供应所，由担任全国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的共产党人钱俊瑞创办和领导，编印各种抗战书报，将《新华日报》社论和大量进步书报送到抗战前线，满足战时军民对时事和文化的需求。随着武汉的失守，战时书报供



1938年9月9日，武汉各界拥护国联援华制日运动游行大会，《新华日报》的横幅引人注目

应所转移到重庆继续开展工作。战时书报供应所旧址，位于江岸区铭新街福新里8号，至今仍存。

军事委员会旧址：武汉会战的指挥中心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旧址，位于武昌区珞珈路45号（原蛇山南麓湖北省图书馆老馆）。1937年12月15日，军事委员会移至武昌，军事委员会及其办公厅、军事处、总务处、秘书处、高级参谋室、机要室设于此处。该建筑建于1934年，造型庄重、风格鲜明，为新旧交融、中西合璧的典范之作。2013年3月5日，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1937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8月



《新华日报》创刊号

12日，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召开，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军事统帅部，统帅全国军队对日作战。随后，军事委员会机构和职权不断扩大。1938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随后，军事委员会各部、院、会、厅等组织条例和内部编制相继制定。改组后机构健全，重点突出，分工明确。同时，与战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地——湖北省立图书馆

集团军——第一线军、师的指挥系统相呼应，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程潜，先后兼任各战区司令长官。经过改组，军事委员会实现了由平时到战时领导体制的转变。1938年1月，“逃跑将军”韩复榘被军事委员会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处决。

武汉行营旧址：武昌沦陷的地标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旧址，位于今武昌彭刘杨路以北，后长街东侧，今已不存。

1936年12月13日，出于对日备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鄂特派绥靖主任公署撤销，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何成濬任行营主任，陈诚任副主任。行营最初在汉口华商街（今江汉二路）绥靖主任公署办公，1937年4月迁至武昌平阅路（今彭刘杨路）。武汉行营下设参谋、秘书、总务、军法、交通、运输、经理、军医、

政训等9处，其职责是主管湖北、湖南两省军事，修建国防工事，指挥与整理辖区内驻军，组织民众训练等。1938年6月行营裁撤。10月26日日军占领武汉行营，武昌沦陷。抗战胜利后，武汉行营建筑作为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驻地。

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旧址：大学体育馆培养抗战将校

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旧址，位于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内。黎元洪字宋卿，生于黄陂，热心武汉教育事业。黎元洪去世后，其家人捐款助建体育馆，校方即以“宋卿”二字命名。该馆建于1935—1936年，代表了民国时期武汉地区室内体育馆建筑的最高水平。2001年，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1938年3月，蒋介石在武汉大学校内开办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后升格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并兼任团长。军官训练团主要分为将官班和校官班，凡未直接参战之部

队，副军长、师长、旅长、团长甚至营长等均抽调前来受训。共举办将官班3期（2、3期在东湖中学举办）、校官班3期，还有党务班1期、陆军空军联络班1期。将官班每期受训120人左右，校官班每期受训1000余人。教师多为陆军大学教师及其毕业生，还聘请有外籍顾问，其中以德籍顾问法肯豪森最为著名。此外，训练团不定时约请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及国民政府各部部长、各兵种负责人来演讲。



1938年10月26日，日军占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



蒋介石在武汉大学大操场检阅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学员



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旧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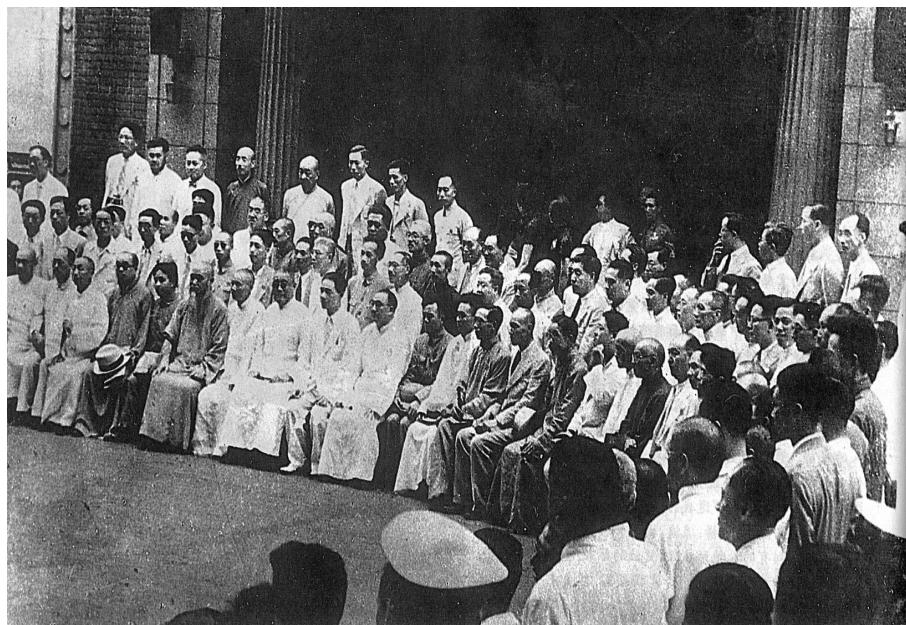
国民参政会旧址：中国各党派第一次政治协商

国民参政会旧址，位于江岸区洞庭街74号（原汉口两仪街上海大戏院，后为中原电影院）。武汉抗战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内各党派空前团结，蒋介石也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抗战姿态，同意召开国民参政会，作为全国最高咨询机关。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大戏院召开，其成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中共毛泽东、王明、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为参政员。

7月15日会议闭幕，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各党派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精诚团结，艰苦奋斗。

国民参政会前期，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共参政员和各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充分利用这一合法的政治舞台，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代表合影



武昌昙华林第三厅旧址（今武汉第十四中学内）

第三厅旧址：文化抗战的战斗堡垒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旧址，位于武汉市第十四中学校内。十四中前身为清末张之洞创办的东路高等小学堂和第二文普通中学堂，1912年改为湖北省立第一中学。2018年第三厅旧址启动保护性修缮，2021年正式开放“第三厅旧址纪念馆”，2008年3月27日列为湖北省文保单位。

1938年4月，第三厅在武昌昙华林成立，厅长郭沫若。第三厅以“文化动员全民抗战”为宗旨，组织和发动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各界力量，让文化抗战成为激发民族意识的重要力量。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第三厅虽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但实际上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

第三厅下辖十个抗敌

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一个漫画队、一个电影制片厂、五个电影放映队及孩子剧团，总数达3000多人，开展了一系列抗战宣传工作，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书写了党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篇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成功典范。

“文协”旧址：吹响文化抗战的号角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旧址，位于汉口总商会大楼（今江汉区中山大道489号）。汉口总商会大楼是民国时期武汉著名建筑之一，总体布局呈现四合院的特点，又兼具西式古典主义建筑的风格，不仅有很高的建筑艺术价值，而且见证了文化界抗战救国的众志成城。2019年10月，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1938年3月27日，“文协”代表在汉口总商会大楼前合影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宣告成立。“文协”的成立，是中国文艺界史无前例的大团结。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笔为武器，通过多种方式揭露日军暴行，鼓舞民众和将士的抗战热情，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壮大作出重要贡献；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帮助作家深入前线和民间，反映抗战现实，激发人民群众抗战到底的意志；创办会刊《抗战文艺》，这是贯通整个抗战时期的唯一文艺刊物，对于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突出作用。

“工合”总部旧址：中国“工合计划”诞生地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部旧址，位于汉口横滨正金银行大楼（今江岸区沿江大道与南京路交会处、中信银行武汉滨江支行所在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与斯诺提出以小型合作社的形式，组织人力物力在后方从事军需民用产品的生产，建设新的经济国防。艾黎对此取名为“工合计划”，“工合”意即“一起工作”。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横滨正金银行大楼挂牌成立，艾黎代理总干事，负责协会组织工作。协会建立后在武汉举办一期合作社讲习班，培养一批去各地开办合作社的指导员。“工合”运动由武汉扩展到中国大地，为支持长期抗战筑起“后方经济堡垒”。



汉口横滨正金银行大楼

中国电影制片厂旧址：抗战电影之光

中国电影制片厂旧址，位于江岸区惠济路39号杨森公馆，原为四川军阀杨森私



1938年，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棚

邸。1928年，杨森选择汉口西商跑马场（今解放公园）以北建起一片5.6公顷的花园，园内布置假山荷池、亭台楼阁、曲径小桥，花园中央设公馆，俗称杨森花园。1931年，武汉遭遇百年不遇洪水，花园景点全毁。1946年5月，国共两党与美国代表在此举行“汉口会议”，达成《汉口协议》。现仅存别墅一栋，作为武汉市招才局办公楼。1993年，杨森公馆列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2014年，杨森公馆（国共汉口会议旧址）列为湖北省重点文保单位。

1936年，“汉口摄影场”创始人郑用之，以每年一块银元的象征性租金，租下闲置的杨森花园，搭起摄影棚，开启了一段光影救国史。1938年，郑用之出任第三厅第六处电影科科长，主持将汉口摄影场扩建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并任厂长。短时间内，推出3部故事片、50余部纪录片和卡通片，掀起了中国抗战电影的高潮。其中，《保卫我们的土地》是第一部表现抗战的故事片，慷慨激昂；《八百壮士》根据淞沪抗战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鼓舞人心。纪录片包括5集《抗战特集》、4集《抗战歌集》、5集《电影新闻》和多部记录短片，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旧址：难童的摇篮

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旧址，位于江岸区一元路与洞庭街交会处日本同仁医院（现为一元路小学），1938年5月至9月设立，在战火硝烟中承担收容和教育难童的重任，成为重要的儿童救助机构之一。



1938年9月，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难童从宜昌入川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大地生灵涂炭，千万难民流离失所，失去父母的儿童处境尤为悲惨。中国妇女界首先行动起来，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部承担起儿童保育会的筹备工作。

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今武汉市第二十中学）召开成立大会，以“教养因抗战被灾儿童”为宗旨。9月，推选宋美龄、李德全为正、副理事长，邓颖超、史良等为常务理事。保育会成立不久，即筹建临时保育院，李崑源任院长。5月1日，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举行开幕典礼，政府要员、各界代表共500多人到会祝贺，蒋介石、宋美龄、周恩来、冯玉祥等参观了保育院。该院对难童实行“保教合一”，共接收转运28批共9000余名难童，使其免遭战火涂炭和流离失所。武汉沦陷前，战时儿童保育会和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迁往重庆。

邓正兵，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
王钢，武汉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

鹰击长空（上）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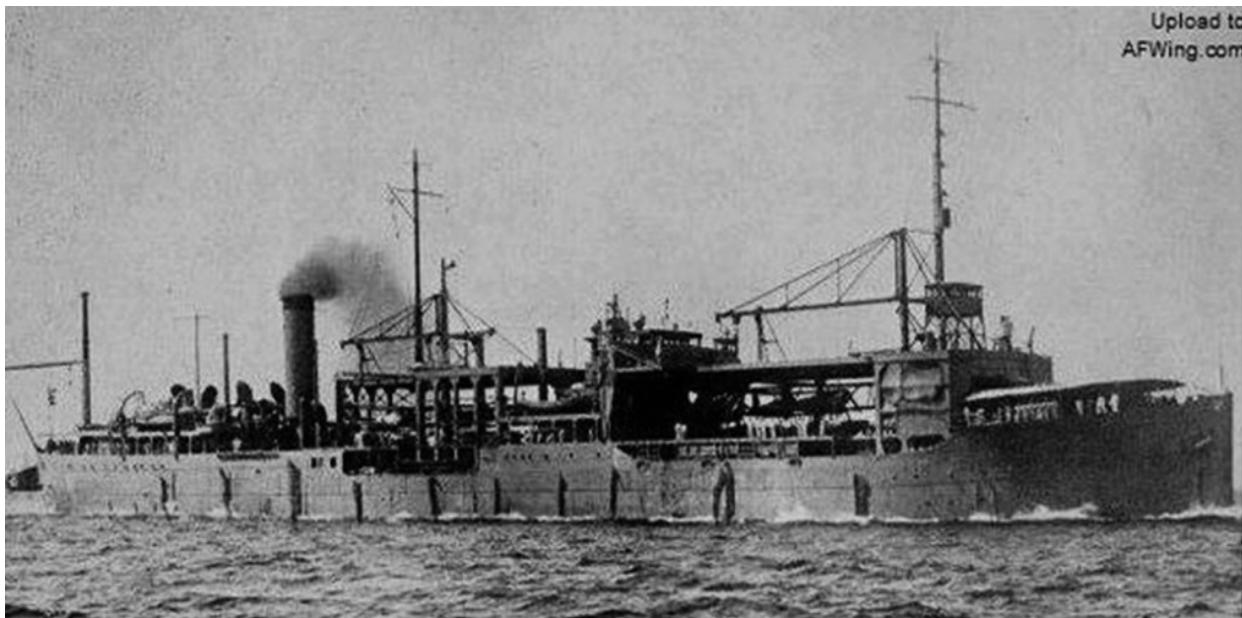
◇ 涂文学

空中作战是武汉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会战中，中日空军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日本飞机数量多，仅海军航空部队第二联合航空队就有390多架。而中国一共只有305架，其中三分之一是侦察机，战斗机不到200架，上海沦陷后只剩下81架。武汉会战时期，苏联向中国提供飞机226架，中国空军力量恢复到300多架。

武汉会战中，日本没有单独的空军部队建制，空军附属于海军和陆军部队。陆军方面，1938年8月2日，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中将）被编入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其主要任务是“抓住良机摧毁敌人空军

战斗力量，并攻击要地”。航空兵团包括18个飞行中队（侦察机3个、战斗机5个、轻型轰炸机6个、重型轰炸机4个），以第一飞行团属第二军，第四飞行团（轰炸）由华中派遣军直辖，第三飞行团分别以一部兵力协助第2、11军作战。8月14日，兵团在南京设立司令部。

海军方面，7月上旬所辖航空部队有空袭队（辖载水上飞机的航母“神川丸”、“能登吕”号、“雉”号），特别队（辖作为特别陆战队的刚本部队、土师部队及特别作业队的“立神”号、“二吴”号、“云泰”号、“胶膀”号），第1空袭队，包括第2联合航空



日本“神威”号水上飞机航母

队（第12、13、15航空队）、前进基地派遣特别陆战队、“苍龙”号派遣飞行队及特别工作队（基地设营），扬子江空袭部队（第3航空战队，包括舰载飞机的航母“神威”号、“香久丸”号）。7月28日攻占九江后，又增派第1联合航空队（鹿屋航空队、木更津航空队）。这样，海军就拥有6支航空部队，包括3艘航空母舰，是为武汉会战中日本空军的主力，其主要任务是“以消灭敌人航空兵为第一义，……同时以最大努力攻击敌要地”。

日本空军狂轰滥炸

拥有强大飞行力量的日本空军，在武汉会战中牢牢掌握制空权，对重点城市、交通要道（主要是铁路）、军事要塞不断狂轰滥炸，并积极配合地面部队作战，除为其提供情报、输送补给外，主要是对中国军队实施空中打击。据李少军《武汉保卫战史事日志（军事卷）》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月

1日至10月30日，日本空军出动飞机轰炸城市、要塞，为日军提供补给并参与陆军作战达263次。

日本空军活动的前期（1938年1至2月），以轰炸武汉、南昌等城市为主，一方面对机场等军用设施进行破坏，另一方面以密集轰炸形成威慑，企图达到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1938年1月，日军轰炸的重点在军用机场，密集轰炸南昌、汉口和武昌机场。2日，鹿屋航空队11架攻击机轰炸南昌机场。4日，木更津航空队12架、鹿屋航空队11架攻击机轰炸汉口机场，中国13架战机被击毁。6日，木更津航空队12架攻击机轰炸汉口机场，鹿屋航空队10架攻击机轰炸汉口和武昌机场。7日，木更津航空队15架攻击机轰炸南昌机场。11日，木更津航空队攻击机15架、鹿屋航空队攻击机9架轰炸汉口机场。12日，鹿屋航空队攻击机12架轰炸南昌机场及附近航空设施。24日，木更津航空队8架攻击机轰炸宜昌机场，中国空军

6架飞机被炸毁，油库、机库及军营被轰炸。27日，木更津航空队9架攻击机轰炸南昌机场，中国空军出动飞机迎战，7架飞机被击落；鹿屋航空队5架攻击机、第2联合航空战斗队12架战斗机轰炸汉口机场及附近的防空设施。

进入2月，日本空军轰炸重点转向城市工厂和市政设施。8日，木更津航空队6架攻击机、鹿屋航空队13架攻击机、第2联合航空队10架轰炸机轰炸汉阳兵工厂和汉口机场。2月11日，木更津航空队15架攻击机、鹿屋航空队9架航空队，第2联合航空队的飞机一起再次密集轰炸汉阳兵工厂，但因天气原因未达目标。其间，鹿屋航空队轰炸了武昌军官学校。4月29日，第13航空队攻击机18架、第12航空队战斗机27架轰炸汉口机场和汉阳兵工厂，造成汉阳兵工厂附近70多栋民房被炸毁，170余市民被炸死，另有120多人被炸伤。中国空军奋起反击，衍生成著名的4·29空战。

6月下旬，武汉会战正式开战后，日本空军主要以侦察情报、提供给养、直接攻击中国军队及轰炸我方要塞为主。黄（梅）广（济）战役中，从8月27日至9月6日，共出动侦察机244架次、轻型轰炸机134架次、战斗机101架次，以配合第11军地面作战。富金山战役中，出动战机对富金山特别是800高地等轮番轰炸，国军阵地被炸毁，山顶一个连全部牺牲。富池口要塞保卫战中，扬子江空袭部队9月23、24日出动十数架战机狂轰滥炸，配合波田支队攻陷富池口。

田家镇保卫战中，日军地面部队同样得到空军的密切配合。9月24日，调集陆军第4飞行团主力、海军第15航空队15架轰炸机、6架攻击机、6架战斗机，对国军阵

地攻击，并攻击从通山增援田家镇的守军。28日，第13、15航空队出动战机170架次，从早至晚不间断地轰炸田家镇及附近地区，配合今村支队地面作战。29日，田家镇失陷。

万家岭战役中，第3、4飞行团为106师团侦察、轰炸、空投军需品，第12、15航空队每天轰炸中国军队阵地。保守估计，这一期间出动各种飞机500余架次。战斗最激烈的10月10日，出动飞机108架次，其中第3飞行团出动侦察机18架次、轰炸机31架次配合106师团作战，另以3架轻型轰炸机、8架次运输机向106师团空投可供3500人使用的粮秣；海军第1空袭部队出动36架次救援106师团，第15航空队12架轰炸机对万家岭及周边地区进行轰炸攻击。13日至14日之间，第3、4飞行团出动飞机60余架次，昼夜不停地为106师团空投粮秣，使其免遭因弹尽粮绝而覆灭的命运。

9、10月除继续上述任务外，日本空军增加了对主要铁路线（浙赣、广九、平汉、粤汉）和武汉至宜昌之间长江航线的轰炸，以期切断中国军队运输线和军民及物资向宜昌和重庆西撤。如10月15、16、17日，连续三天轰炸浙赣线、平汉线和粤汉线。15日，第1空袭队战机数十架攻击平汉线，第2空袭队24架战机攻击粤汉线。16日，第2空袭队战机攻击粤汉线要站株洲、岳阳，第3飞行团20架战机空袭株洲。17日，第13航空队18架飞机猛烈轰炸平汉线上的广水、花园、肖家港车站列车及街市，同时又派出18架飞机轰炸粤汉线岳阳和羊楼洞车站，部分铁路被炸毁。24日，第15航空队18架轰炸机和攻击机在咸宁、蒲圻、嘉鱼和金口等地区，轰炸和攻击粤汉线列车和金口至嘉鱼之间长江上的轮船。当日15时

许，奉命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山舰巡航在金口江面时，遭遇6架敌机轮番攻击，舰长萨师俊带领官兵英勇反击，舰只尾部等要害部位中弹后沉没。

日本空军对武汉等城市的密集轰炸，造成人员重大伤亡和财产巨大损失。7月12日，海军近40架飞机空袭武昌、汉口，炸毁房屋105间，炸死181人，炸伤448

人。仅在8月，日军就空袭武汉12次，投弹1715枚，炸死炸伤3112人。（参见李尔昌：《回忆周至柔》，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P219）。

面对日本空军的频频侵犯和狂轰滥炸，中国空军在苏联空军的支援和配合下予以猛烈回击，一场场激烈的空战在武汉上空悲壮上演。

“2·18”空战

武汉空战最早于1938年2月18日展开。这一天，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上午6时左右，日海军木更津航空队攻击机经鄂东北飞向重庆，对重庆广场坝进行轰炸。中午12时左右，轰炸机15架、驱逐机30架进犯武汉，中国空军第4大队（志航大队）驻汉口第21、23队、驻孝感第22队分别起飞，在汉口机场附近空域迎战敌机。

据2月18日《空军战斗要报》记载，第21队12时45分得到日军侵袭警报后，



苏联志愿队机群飞临台湾松山机场

即以10架E-16式战机起飞，成V字型队于汉口机场西北方上空与敌开战。战机升空后，发现机场西北方上空有敌轰炸机12架、驱逐机10余架，成V形战斗队形，当即掩护双翼机，即第21、23两队E-15式飞机与敌驱逐机战斗，进行约15分钟，敌机向东逃逸。国军飞机穷追不舍，第22队队长董明德、飞行员杨孤帆、柳哲生等4架战机相互协同，击落敌驱逐机1架，该机在新洲仓库附近农田坠毁。

与此同时，第21队第2分队队长王远波和第3分队队长李文祥分别率队在黄陂上空与敌机战斗，击落敌驱逐机各1架，击伤1架。2架被击落的敌机，1架坠毁于汉口机场西北角约6、7公里处，1架坠毁于武昌东湖附近水中。第23队共有11架战机参战，13时起飞后在汉口机场西北角与敌12架飞机交战，队长刘志汉击落敌机1架后，飞机发动机爆炸，跳伞逃生成功。队员冯汝和击落敌驱逐机2架，张明生击落敌机1架。队员吴鼎臣击落敌机1架后，见队

友 1 架战机被敌机攻击，当时奋不顾身俯冲增援，敌机见状慌忙爬升逃避，导致吴鼎臣飞机与队友另一架飞机相撞，吴鼎臣跳伞逃生，两机均毁。

第 22 队 12 时 45 分从孝感起飞，到汉口与第 21、23 队会合，在汉口机场北面遭遇日军 5 架驱逐机，副队长刘宗武击落 1 架，队员信守翼击落 1 架，并协同第 21 队队长董明德击落 1 架，取得击落敌机 3 架的佳绩。

“2·18”空战共击落日军战机 12 架，其中 1 架为高炮击落，日军王牌飞行员、空袭编队指挥官金子隆生被打死。中国空军损失飞机 10 架，其中被击落 9 架。5 人阵亡。第 4 大队队长李桂丹身先士卒，带队杀敌光荣牺牲。当时报道说：“李队长为人干练，战术精良，过去曾击落敌机八架，厥功甚伟。”

“2·18”空战是武汉会战时期中日空军首次对决，中国空军首战大捷，打破了日本空军独占制空权、不可战胜的神话。武汉各界欢欣鼓舞，许多市民自发前往敌机坠机现场参观，当时报道说：“昨日敌机坠落地点，虽离距汉口市区辽远，而市民前往观看，络绎于途，莫不喜形于色，甚有涉水探取敌机零件碎片，作为纪念品者，共敌忾同仇之心，可见一斑。此次我空军英勇歼敌，建立奇功，洵使倭寇心寒胆落也。”（《空中鏖战激烈》，转见武汉市档案馆等编：《保卫大武汉——纪念武汉抗战六十周年专辑》，《武汉文史资料》1998 年第 3 辑，P190）。

2 月 21 日，武汉各界举行万人集会游行，庆祝“2·18”空战大捷。

突袭台北

台北松山机场是日军重要空军基地，骄狂的日军以为远离中国大陆没有被攻击的危险，因此毫无防范，飞机和地面设施没有任何伪装，空中亦毫无警戒，这就给中国空军突袭提供良机。

2 月 23 日，经过精心策划和认真准备，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以轰炸机大队组成共 40 架轰炸机的联合编队，分别从汉口和南昌两个机场出发，对台北松山机场进行突袭。汉口方面 10 架 CB 轰炸机上午 8 时起飞，中午 12 时左右飞临台北松山机场，“该处敌机场停放敌机甚多，被命中，棚厂亦被炸起火，事前似全无防空准备，既无高射炮射击，亦无飞机起飞驱逐。我该十机于任务完毕后，回经丽水加油，除两架陷入泥中浆坏，俟明（24）日可飞回汉口外，均于 17 时 30 分安返汉口”。南昌方面“我 CB 新轰炸机 11 架，内 5 架由我国



空战英雄陈怀民与妹妹陈难

飞行员驾驶，于8时30分由南昌出发，距台北约尚有20分钟航程之处过云，乃折回经丽水加油后均返南昌”。（《空军战斗要报》，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56）。

“2·23”突袭台北松山机场，战果颇丰，炸毁日军飞机18架、营房10座、机库2座。日本当局恼羞成怒，一批官员受到严厉处理，驻台湾行政长官罢免，松山机场指挥官和军事基地主任撤职并交军事法庭审判，松山机场警备司令切腹自杀。

“4·29”空战

“2·18”空战后，日本空军忙于徐州会战，加上“2·18”空战造成的损失，使日军对中国空军有所忌惮，所以武汉上空难得安静了一段时间。



邓颖超、孟庆树等代表妇女联合会向空战英雄献旗

4月29日，这一天是日本天皇的生日“天长节”，为“庆祝”天皇生日，日本海军航空兵佐世保第12航空大队和陆军航空兵第2联合航空队，共出动轰炸机45架对武汉进行大轰炸。

下午1时左右，敌机从皖赣边境向湖北进犯，约2时许到达武汉上空，对汉口机场、汉阳兵工厂及汉水附近汉口、汉阳民房狂轰滥炸，造成人员近200人伤亡和70余栋房屋被毁的重大损失。中国空军与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出动2个大队共67架战机，分别从汉口、孝感和南昌机场起飞，在黄冈与武汉之间空中与敌机展开殊死搏斗。

下午2时40分，6架敌机进入视线之中，我军“乘敌机猝未及防，突从高空凌下，向其猛扑，敌我稍经交绥，我军即将数敌机操纵在手，该数敌机嗣虽力图挣扎，然竟不能逃吾死角射击，于是敌机数架先后中弹，焚毁坠落”。（《空军再创光荣战绩廿一敌

机葬生武汉1938年4月29日》，汉口《大公报》1938年4月30日）。更激烈的战斗在武昌东部上空展开，“我空军口口大队之一部，合计精锐之驱逐机九架，在毛大队长领导之下，此次肩负保卫武昌东部上空之忠勇任务，又先与大群之敌方驱逐机遭遇，敌机约有十八架至二十架之多，但我口口大队之青年战士，

无不身经百战，气吞山河，当即奋然驰入敌机密集群中，与之死拼。经过三十分钟壮烈无比之缠斗，我四四队队长刘宗武，当即击落敌驱逐机二架，刘志汉击落一架，杨慎远亦击落一架，一时将密集之敌驱逐机群完全驱散，雁不成行，零星遁去”。（《中央社讯：四·二九空战记实 1938 年 4 月 30 日》，转见武汉市档案馆等编：《保卫大武汉——纪念武汉抗战六十周年专辑》，《武汉文史资料》1998 年第 3 辑，P191）。

战斗中，年仅 22 岁的飞行员陈怀民驾驶的战机不幸陷入 5 架敌机的重重包围之中，陈怀民左冲右撞，难以脱身。情急之下，他开足油门，冲向敌机，“当其奋战时，全武汉军民莫不仰望天空，为之焦急感奋，欢呼顿足，至于涕零。但如此猛烈之空中缠斗中，我战士流星一瞥，猛撞敌机，而与敌机同归于尽。呜呼烈矣！该烈士究属谁氏，经记者多方探寻，一时尚难查明。然队员陈怀民迄今未归，夕阳西坠，而空际仍无翼声，是则此壮烈无比之肉弹，果非陈氏。而陈氏亦不归矣！壮哉吾烈士，烈者吾英雄！”（《中央社讯：四·二九空战记实 1938 年 4 月 30 日》，转见同上）。

此次空战，大约进行 30 分钟左右，“自武昌以至黄冈上空，漫天焰火，均属被我击坠之敌重轰炸机残骸，合计此方面敌机被我击落者，约达十之八九”。（《中央社讯：四·二九空战记实 1938 年 4 月 30 日》，转见同上）。

“4·29”空战战果颇丰，据《大公报》报道：“我共击落敌机 21 架，计重轰炸机 10 架，驱逐机 11 架。坠落地点，经已查出者如下：孝感附近有重轰炸机两架，黄冈一架，梁子湖一架；驱逐机有东湖一架，青山一架，段家店一架，谌家矶一架，洪山附近

一架，武昌东郊一架，纸坊一架，徐家棚一架，豹子澥一架，刘家庙一架，其余数架，皆落在沿江青山、阳逻及沿江附近一带，现正派人搜查中。又敌机之飞行员，被我俘获两员，现正问讯中。”

此次空战，日军 50 名飞行员战死，2 名被俘，被击毙的飞行员中，有被陈怀民撞机坠毙的日本吹嘘的所谓“红武士”高桥宪一。中国空军亦付出巨大代价，据日方称击落中国飞机 51 架，日军仅损失 2 架，显然为不实之词。《大公报》报道称，“至我方情形，有机 5 架迄未返防，并有 2 空军将士乘跳伞安全下降，余情待查中”。（《空军再创光荣战绩廿一敌机葬生武汉 1938 年 4 月 29 日》，汉口《大公报》1938 年 4 月 30 日）。最终结果查明，中国空军损失飞机 12 架，包括陈怀民在内的数名飞行员壮烈殉国。

涂文学，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共在武汉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

◇ 程子莹

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开创了外交和对外宣传的新局面。

全民族团结抗战，国际统战工作起步

中共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得以在武汉集中开展，基于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

首先，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使各阶级、各党派认识到，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同时，随着局势日益恶化，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战场，对中共的态度有所转变。在经过7个月的多次谈判后，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由中共倡导和推动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了共同的抗日目标，国共两党在一段时间内有了较融洽的合作气氛，这就为中共通过公开渠道向国际社会宣传自己的抗日救国主张提供了可能。

其次，武汉地处中原腹地，水陆交通枢纽，具有军事重镇和战略指挥中心地位。淞沪抗战失利后，蒋介石于1937年10月29日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作《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报告，决定国民政府迁渝

远离战区，而留军委会驻节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报告中的“就近”指的就是武汉。随后，英、美、法、苏、意、比等国驻华使节来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内政部、经济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等机构迁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及爱国民主人士等也汇聚而来。武汉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为中共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有利空间。

在抗战初期，中共“党的组织力量，在全国一般地说来还是很微弱的。全国的群众力量也还是很薄弱，全国工农基本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1]为此，毛泽东指出，“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2]，要“争取党在全国的公开地位”“发展党与巩固党，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3]。

1937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在《张闻天、毛泽东关于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的方针和部署致秦邦宪等电》中指出：“上海失去后，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因此，党的干部亦应重新分配，一部分应去武汉，一部分去战区，一部分环境较好的仍留下，工作方式应有必要的转变。”^[4]中共派出大批干部、党员率各种抗日救亡力量奔赴武汉。其中，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是中共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机构。

此前10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汉口成立。12月，南京办事处与武汉办事处合并，迁到汉口原日租界大石洋行。八办是中共及人民军队在国统区的合法联络中枢，来汉的国际人士均由其介绍到延安或前线根据地。同月，在武汉组建长江局，即是为了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的组织；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开展对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工作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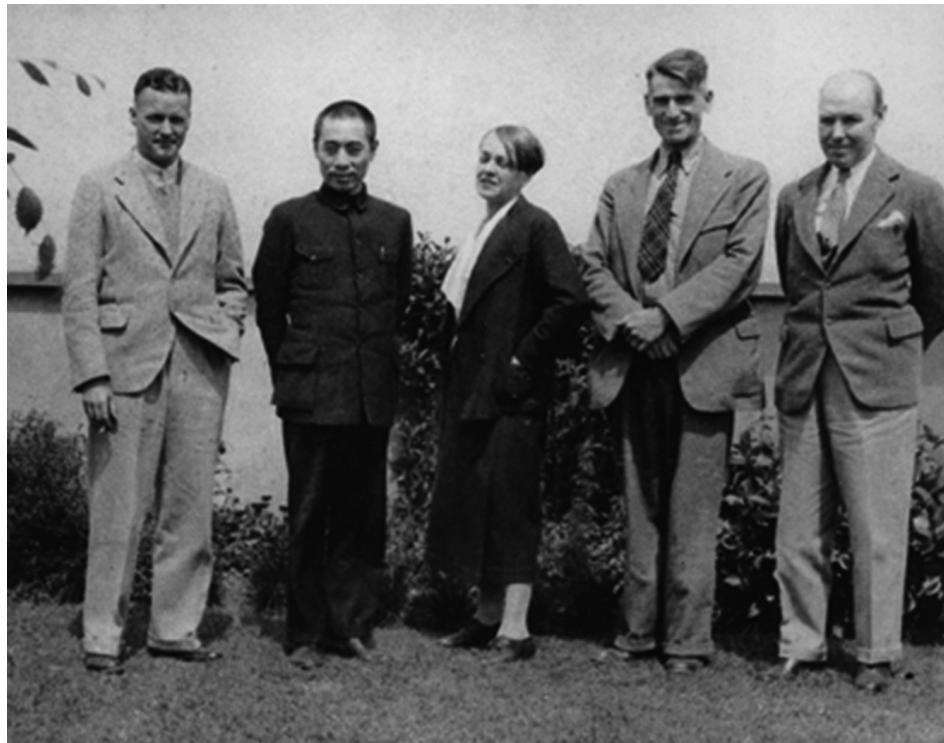
建立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工作等。

1938年4月，长江局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和王炳南，对外称十八集团军国际宣传委员会。下设国际宣传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王炳南任组长，工作人员有王安娜（王炳南的妻子，德国人）、许孟雄、毕朔望等人，可使用多国语言沟通。据王炳南回忆，国际宣传组主要有三项任务：一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包括第一次将毛泽东著作印成外文向国外发行；二是给莫斯科国际通讯英文版投稿，宣传中国的抗日情况和中共的政策方针；三是开展外事活动，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5]国际宣传组是中共的第一个对外宣传机构，它的成立对于打开外事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拓宽国际交往，打破外交隔绝

武汉期间，中共统一战线及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工作处于高潮阶段。作为战时首都的武汉，驻有中外记者、外交官、传教士、学者和商界人士等，这一方面给了中共扩大接触面的机会，联通了武汉与延安、延安与世界，增强了抗战的力量；另一方面使外国人与中共建立联系的难度大大降低。“只要通过访问八路军的汉口办事处或新华社，就可以结识中国共产党人。”^[6]由于国民党当局多年来的新闻封锁，过去只有埃德加·斯诺等很少外国人向外报道过中共的真实情况，而一年后国际社会已经拥有关于中共的大量一手资料。

1937年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指出：“采取一切办法，取得世界和平阵线各国的援助，同人民阵线的国家、同苏联建立密切的



周恩来和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在武汉

合作。”^[7]根据中央指示，长江局把国际统战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主要由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1937年12月18日抵达武汉，1938年10月25日汉口沦陷前数小时离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事大量外事活动。他对国际宣传组指示：对在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的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都邀请他们参加；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的新闻资料，这些资料由于及时和准确，往往比国民党通讯社的资料更受外国记者的重视；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接待。^[8]

在联络驻华外国官员方面，周恩来除了同苏联使馆保持密切联系外，还以中共代表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配合国民党进行外交活动。他会见了英、美等国驻华大使，阐明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希望国际社会识破日本、德国的

“和谈”阴谋，积极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他肯定这些国家在某些方面转向援华的态度，同时提出有的国家仍采取“不干涉”“绥靖”政策甚至企图搞“东方慕尼黑”，有引诱国民党当局向日本投降妥协的危险性。^[9]

为了促成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设立，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多次积极商谈，最终在

卡尔的帮助下获得香港总督批准。香港办事处与武汉办事处一道，不仅承担了联络中枢的功能，还在香港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实绩，积极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例如协助宋庆龄建立国际性救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吸引和团结国际友人、海外侨胞投身到东方战线。许多国际捐赠物资由香港经惠州转运到武汉，再由武汉运往延安。这些交往开创了中共代表同外国使节直接接触的先例，打破了中共同与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隔绝的状态。

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两次对八路军和延安开展广泛考察，周恩来为他安排了访问。卡尔逊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关系紧密，罗斯福要求卡尔逊以信件形式秘密报告他在中国的见闻，因此卡尔逊的观察十分重要。

卡尔逊的足迹遍及陕西、绥远、山西、

河北和山东等省，他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多位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入长谈。卡尔逊返回武汉后，不顾外交官身份，激动地赞扬中共的军事、政治机构和制度，与聚集武汉的各国记者广泛交谈，有问必答。回到美国后，还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国的双星》《中国的陆军》，向世界传播了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真实情况。

在联络国际友人方面，周恩来多在八办、珞珈山宿舍接待会见，也不时登门拜访。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八路军第一位随军外国记者，她坚持在前线报道中国军民抗战，对中国感情深厚。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武汉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全力救护伤员和难民，组织培训医护人员，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呼吁国际社会援助。周恩来多次会见她，详细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赞扬她的国际主义精神。

史沫特莱还在中共与来华外国人之间充当向导角色。她住在美国吴德施主教在汉口鄱阳街的住宅中——这里是中共领导人、援华国际友人的重要联络场所。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出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医疗队援华，史沫特莱从中安排协助，使之于1938年1月下旬顺利抵达武汉，再前往延安。

周恩来等长江局领导人多次与医疗队会谈，感谢他们援助中国革命。周恩来说：

“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奉献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10]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巴苏，在日记中详细回忆在武汉的经历：八路军代表为医疗队举行欢迎晚宴，不同国籍的人用不同的语言唱起各国的战斗歌曲，并齐声高唱《国际歌》，相互鼓舞，增进感情。史沫特莱和国际宣传组同志

陪同参观新华日报社等处，一起讨论中国的形势和政治问题。周恩来、叶剑英、凯丰等长江局领导人热情会见他们。所到之处不分官兵、军民的融洽气氛，深深感染医疗队的每位成员，使他们重新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投身于外事工作的忙碌身影，给巴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同志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大厅里挤满了中外记者。……由于太忙，他没有时间刮脸。在讲话中间，他不时去接电话或阅批电报。桌上铺满了档案、文件、地图和书籍。他正在介绍当前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新华日报》的编辑章汉夫先生将他的话译成英语。他听着英语翻译，必要时纠正一些词句。招待会结束时，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并对我们愿意到遥远的华北去为八路军服务表示高兴。”^[11]

3月，荷兰共产党党员、进步电影工作者伊文思，受宋美龄邀请拍摄新闻纪录片来到武汉，在拍摄过国民党方面的镜头之后，希望拍摄一些中共抗战的画面。周恩来专门致信郭沫若，请第三厅派人协助。伊文思原计划去延安拍摄，但遭到国民党的阻拦。为了弥补伊文思的缺憾，周恩来安排拍摄中共代表团活动及武汉群众献金运动的镜头。由于八办房间较小，长江局领导人开会的场景是在教室中临时搭建的。这部影片，就是在国际上产生一定影响的《四万万人》（又名《一九三八年的中国》，配乐是《义勇军进行曲》）。伊文思回忆：“这次访问认识了周恩来，并得到他许多的关照，也了解到中国的许多真情，同时也因此对周恩来的伟大、深谋远虑和文武全才有所体会。”

在组织、响应国际团体和活动方面，中共中央指示：共产党员不应拒绝去参加国民党所包办的有群众的抗敌后援会。参加的目的，是争取后援会的群众走上积极抗日的

道路，团结其中左倾的积极分子在自己的周围，并利用后援会的合法组织与其中的积极分子去开展群众的救亡运动。^[12]

1938年1月，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具有国共合作属性，名誉主席团成员、理事均包含国民政府要员和中共领导人。它充分发挥社会各界资源广泛的优势，在研究国际问题、开展国际宣传、推进国民外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5月，世界学联代表团到访武汉，各党派、群众团体代表和外国人共400余人出席招待茶会，周恩来在会上致词。在代表团完成周边各省考察后，周恩来周密布置代表团赴延安参观，并安排随行记者采访报道。世界学联代表团将考察报告递交给世界青年和平大会，揭露日本侵略恶行，赞扬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号召世界青年援助中国抗战。

6月，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从上海到达汉口，和斯诺等人筹划“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计划在全国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希望得到包括国民政府在内的各方面的资助。中共代表团予以积极支持。周恩来告诉艾黎，组织“工合”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推动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并尽可能多争取国际支持。同时还对组织性质和人事安排提出了建议^[13]。“工合”成立后，积极宣传中国抗战的重大意义，在海外华侨和国际人士中募捐，将筹集到的物资款项转送延安，对中国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此外，长江局与国际友人斯诺、爱泼斯坦，记者德尔丁、贝特兰、斯特朗，美国主教鲁茨、作家贝尔登，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等人都在武汉有过密切交流，支持外国人士成立“支援八路军援助委员会”。

长江局和八办接待一批又一批访问武

汉或者参加援华工作的外国人士，通过他们的真实见闻向世界传播自己的主张。

创办公开报刊，增强国际团结

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加强抗战力量，毛泽东指出，要“加强国际宣传（电影、画册、报章、共同宣言、代表团等），取得各国的同情援助”。^[14]除了通过国际友人打通对外传播的渠道外，中共在武汉国统区还创办了合法、公开的党报党刊《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增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宣传力量。

中共中央为了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促进国共两党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多次要求国民党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保证全国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在国统区出版发行报刊取得了合法权利，于是在南京争取《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获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批准。因战局紧张，筹备工作迁移武汉后，长江局下设党报委员会和《新华日报》董事会加强对报刊的领导。由于蒋介石授意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拖延报纸的申请注册，中共中央一边继续与国民党交涉，一边抓住刊物控制较松、可以直接向武汉市政府申请的情况，率先于1937年12月11日创办了中共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在周恩来说服国民党后，《新华日报》才于1938年1月11日问世。由于《群众》周刊从编辑、出版到发行、管理的人员都与《新华日报》高度重合，所以它实际上是《新华日报》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在促进国际统一战线的发展上，主要做了以下两大工作：

一是发布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来认识的文章。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促进国际统一战线的发展上，主要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发布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来认识的文章，以社论、短评、专论的形式，阐明抗日战争与国际统一战线的关系。例如，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反侵略国际宣传周“工农日特刊”题词：工农大众，是中国抗战的柱石，是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先锋；为“五一纪念专刊”题词：联合全世界工人阶级反抗暴日的侵略以保障世界和平。1938年2月2日社论《展开世界援华运动》和16日专论《国际反侵略的统一战线》指出，我国人民英勇抗日，是巩固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推动力，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每一个胜利，也是给予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以极大的实际援助，互相支持、互相呼应，共同战胜侵略者——德日意法西斯。

另一方面，报刊通过分析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局势，给予受到侵略的国家和人民支持。例如，报刊积极反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人民反意斗争、法兰西人民阵线的斗争，旗帜鲜明地支持英美人民敦促他们的政府转变对德日意法西斯中立立场和政策的行动。

二是报道和赞颂世界援华运动。

《群众》周刊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新华日报》的《抗战与外援》等文章引导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和对待抗日战争与争取国际援助的关系，指出要“运用国际有利条件”“争取外援是迅速达到民族解放的必要条件”。苏联大规模的物资援助和军事援助，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设立专门组织推动援华，国联同志会呼吁会员国制裁日本、援助中国，世界各国工人抵制日货、拒绝给日本运送物资等援华行为，都是报道的重要内容。《新华日报》还开辟了专栏报道海外侨胞的救亡运动，发布了《华侨援助抗战》《开展华侨救国运动》《加紧华侨抗战工作》《海外侨胞积极援助祖国抗战》等文章。

长江局把香港打造为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在武汉成立了归国华侨战地记者办事处，向各国华侨组织撰写通讯稿。这些对于调动海外侨胞抗战热情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

同时，长江局和两报刊与中外记者建立许多关系，了解到许多外国舆论情况，甚至获得国民党亲日派对日投降妥协和反共的信息。

中共在武汉创办的党报党刊，为指导抗战和鼓舞抗日斗志，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

综上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抗战和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充分结合武汉的政治条件，深刻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原则，广泛接待国际人士和团体，创办合法公开的宣传刊物，充分发挥了国际友人的桥梁作用，向世界清晰传递中国抗战的实际和中共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有效争取了国际社会道义和物资上的支持，为后来中共对外交往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 [1]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395页。
- [2]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页。
- [3]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0页。
- [4]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 [5] 王炳南《抗战初期中共在武汉的外事活动》，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61辑，1995年，第19页。
- [6] [美]肯尼迪·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第73页。

[7]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1979年，内部资料，第466页。

[8]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514页。

[9] 童小鹏《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武汉》，《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11页。

[11] [印度]比·库·巴苏《巴苏日记》，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27页。

[12]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页。

[14]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程子莹，中国政协文史馆研究部编辑

“三毛之父”在武汉“漫画抗战”

◇ 翁婉琳 吴继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有“三毛之父”之称的著名漫画家张乐平，与叶浅予等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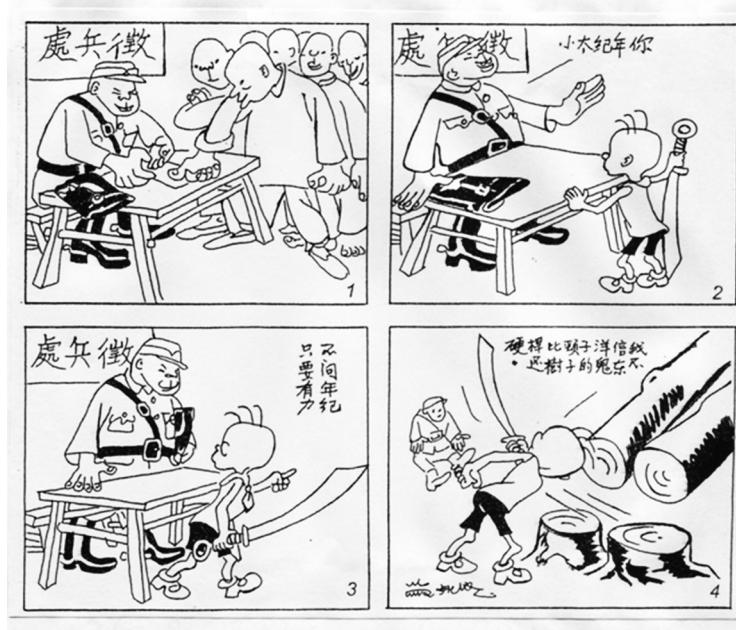


张乐平与他的抗战作品（1938年武汉）

上海组成“救亡漫画宣传队”，后来到抗战文化中心武汉。张乐平担任军委会政治部漫画宣传队（亦称抗敌漫画宣传队）副队长，在《抗战漫画》《抗战画刊》等刊物发表《惟有军民合作，才能消灭敌人》《最后的挣扎》《侵略者的坟墓》《不愿做奴隶的同胞都起来了》等数十幅漫画作品，参加了黄鹤楼抗战壁画的绘制，积极担负第三厅组织的各项宣传工作。其中，特别创作了“三毛抗战”系列漫画及“武汉的神经麻木症”系列漫画，在唤醒民众、增强民族意识、宣传抗战等方面发挥了有力作用。

“三毛抗战”系列漫画

在武汉时期，张乐平在《抗战漫画》等报刊上，陆续发表三毛漫画，如《三毛的大



《三毛的大刀》

刀》《三毛的爸爸》《可以智取》《从敌人枪刺下逃出的三毛》等。“三毛”尽管人小力单，但爱国热情不减，积极投身抗战。作为孩子的三毛，尚能为抗战不懈努力，那么大人更应担当民族责任。

《三毛的大刀》描绘人们排队报名参军，三毛见了也要入伍。征兵处见他个子太小，以“你年纪太小”拒绝。三毛说“不问年纪，只要有力”，就挥起大刀砍倒两棵大树，喊出：“我不信东洋鬼子的颈子比树干还硬。”决心和勇敢溢于画面。这幅作品表现三毛决心参军杀敌、报效国家的英勇气概，鼓舞人们拿起大刀向日寇头上砍去。

《从敌人枪刺下逃出的三毛》描绘三毛从敌人枪刺下逃出后组织宣传队，在他的动员

下，很多人都走上战场。这幅漫画由12个方格组成：（1）三毛有爸有妈；（2）下了学还要牧牛；（3）鬼子打来了；（4）爸爸和妈妈遭了敌人的屠杀；（5）三毛只得跟随叔父逃往后方；（6）叔父投军去了，只得放下了他；（7）肚子饿了，不知道怎么好；（8）村上的人不理睬他；（9）在村口遇见一群小学生；（10）三毛将自己从敌人枪刺下逃出的经历告诉了大家；（11）小学生马上成立了一个宣传队，他当队长；（12）全村人被他们说服，壮年的都去投军。三毛尽管年少，不能上前线杀敌，但他承担起力所能及的宣传工作，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敌人枪刺下逃出的三毛》



《三毛的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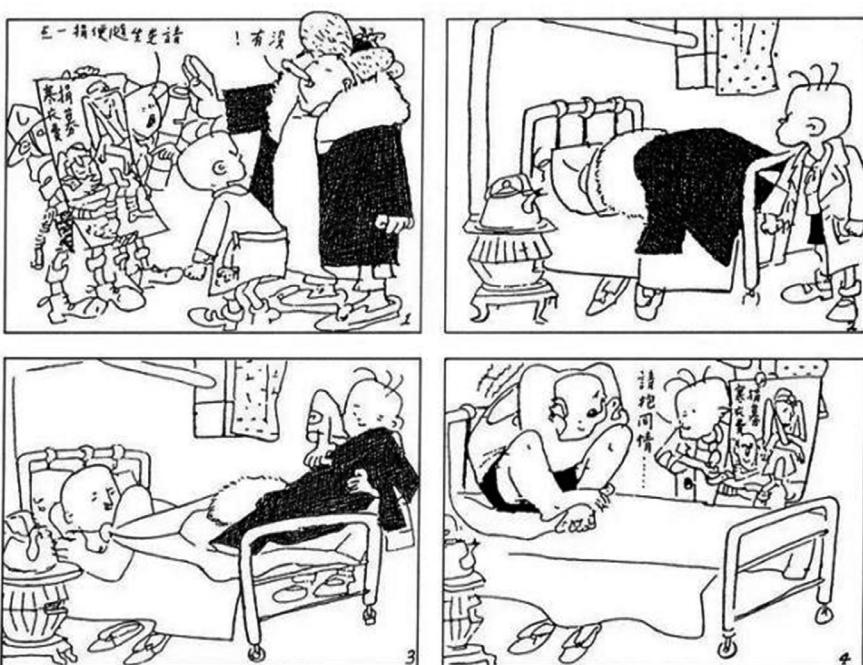
《三毛的爸爸》讲述三毛的爸爸为逃避服兵役而被三毛揭穿，最终走上从军杀敌的道路。第一幅描写三毛的爸爸看到政府发布的征兵布告：“强邻入庭，国难益亟。保国保家，男儿天职。未逾四十，速投兵役，如有规避，严办不赦。”

第二幅描写三毛的爸爸为了逃避服兵役，回家在镜子前男装女扮。第三幅描绘三毛带领征兵处的人来到家中，三毛的爸爸头戴花头巾纳鞋底，企图蒙混过关。第四幅描绘三毛一把将爸爸头上戴的花头巾扯掉，露出男儿原型去服兵役。作品肯定了三毛为抗战大业而“大义灭亲”的行为，表明为了救中国、打日本，每个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

务。在这幅漫画中，张乐平通过艺术夸张，突出了幽默与戏剧性的特点，对那些消极抗战的市民给予了讽刺。

《可以智取》讲述三毛劝人为抗战捐赠的故事。在一个募捐寒衣的地点，募捐者正在向一位身穿大衣者说“请先生随便捐一点”，对方却十分干脆地拒绝了。三毛在一旁看了心生一计，跟随此人来到房间，见其盖着大衣睡

觉，就将大衣拿下，那人被冻醒了蜷缩一团。在一旁的三毛乘机说：“请抱同情！”意即将心比心，前线将士没有寒衣更为艰难，从而让其捐款。故事虽然有些滑稽和极端，但宣传了为前线将士募捐寒衣的意义。



《可以智取》

“武汉的神经麻木症”系列漫画

全国人民积极支持抗战，也有少数人只考虑眼前利益，只顾自己享乐偷安，甚至患有神经麻木症。由此，张乐平创作“武汉的神经麻木症”系列漫画，对消极抗战的现象给予讽刺。

第一篇是《抗敌标语没有戏院的广告引人》，描绘一群人对橱窗中抗敌标语视而不见，却聚集在戏院广告前指指点点，讽刺自耽于逸乐的行为，以此警醒民众。在武汉的著名漫画大师丰子恺编辑《漫文漫画》一书，选用了这一幅作品，并配上题为《警钟》的短文。

丰子恺在文章中指出：前方正在血战，后方间有醉生梦死的人，管自耽于逸乐，或穷奢极欲不稍敛迹者。这些人并非丧尽天良，毫无同情，实因眼光短浅，只见目前而不能想象眼睛背后的情形之故。倘一旦拉他们上前线，请看一看血泊肉弹的惨状，则人非木石，心中总有感动，行为自当改变。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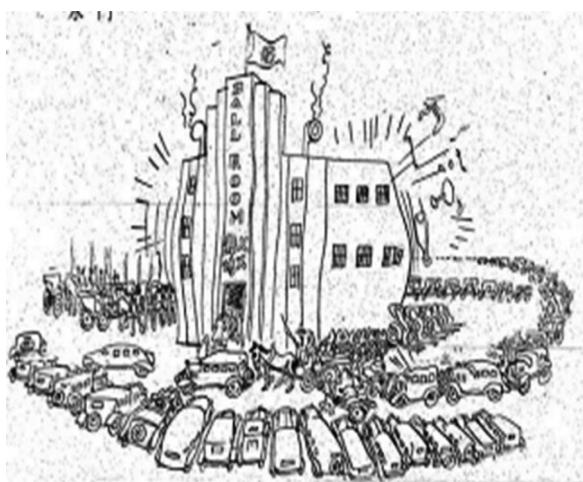
《抗敌标语没有戏院的广告引人》

这些人究竟是少数。现今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明白国难严重，都知道刻苦自励，都怀着敌忾同仇，连老妪小孩都知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武汉的神经麻木症”系列漫画，对置抗战民族大义于不顾、享乐偷安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如《花天酒地反而加倍热闹》讽刺一些人不顾战时的紧急形势，大吃大喝、饮酒作乐、铺张浪费；《跳舞场门前的车水



《花天酒地反而加倍热闹》



《跳舞场门前的车水马龙》

马龙》描绘跳舞场生意火爆，里面的声音震耳欲聋传出屋外，门前停满了各式车辆，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与民族危亡的抗战形势格格不入。

“武汉的神经麻木症”系列漫画切中时弊，引起民众反思。漫画家刘蕴子受此启发，创作了《武汉的神经麻木症染传到西安去了》，足见其影响。

其他抗战题材的漫画

在武汉期间，张乐平还创作了《日寇在南京杀人比赛》《候敌深入，一鼓歼灭》《没有眼睛的炸弹》《一颗子弹必须打死一个敌人》《穷凶极恶的结果》《将来我们所看得见的结果》等数十幅漫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讴歌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日寇在南京杀人比赛》揭露日军将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缚于木桩上，用刺刀全部捅死的残忍场面，直观展现了日寇肆意屠杀百姓、剥夺生命的罪行。这幅作品是参加苏联“中国抗敌漫画展览会”的45幅作品之一，并于1938年4月6日登上《新华日报》的报眼。另一幅《敌军在华之暴行》中，同样将日寇举枪残忍虐杀百姓的血腥暴行展现于读者面前，寥寥几笔刻画出敌寇的嚣张气焰，唤醒民族气节，激发踊跃抗日。

《啊！中国孩子！》发表在1938年4月16日出版的《抗战漫画》上，画面上一个日军士兵在一片废墟中找到一个婴儿，旋即把婴儿使劲抛向空中，另一个士兵用锋利的刺刀对准正在下落的婴儿。这幅漫画也参展苏联“中国抗敌漫画展览会”，激起了国际舆论对日寇野蛮侵略的强烈声讨。

《幻想中的无敌空军》发表在1938年



《啊！中国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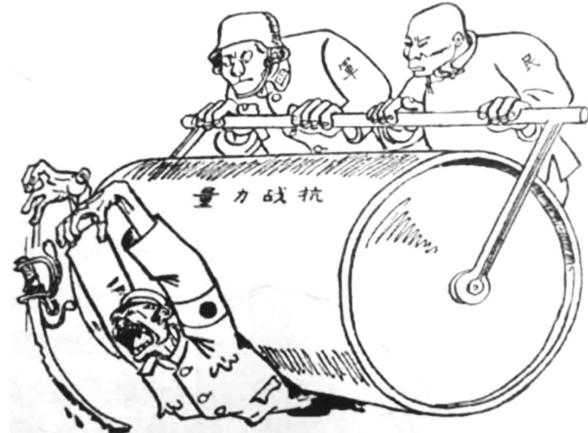
1月16日出版的《抗战漫画》上，一架“无敌空军”战机在敌人阵地上空呼啸而过，威武无比。张乐平用充满想象力的文字写道：假如我们有了这样巨大的海陆空三用的“无敌飞机”六架，数小时内即可以消灭倭军的一切武器。因为“无敌飞机”可以喷射消铁药水，熔化他们的大炮；巨型磁石可以抵御



《幻想中的无敌空军》

炮弹，并吸去倭兵的枪械；空降伞放下的狮子可以消灭他们，这就是以暴易暴的报复。还有电网可以捕捉他们的飞机，一种先进的炸弹能非常精确地轰炸他们的兵舰和阵地……这幅漫画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思想及对祖国国防现代化的渴求。

4个月后的1938年5月20日，中国空军徐焕升等驾驶的两架轰炸机从汉口起飞，第一次出境空袭日本本土，扔下百万份抗战宣传传单，其中许多配有漫画宣传队绘制的漫画。这次远征的成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在国外也传为佳话，欧美舆论赞为“人道和野蛮的对比”。



《唯有军民合作，才能消灭敌人》

《唯有军民合作，才能消灭敌人》，是反映军民合作抗敌的代表之作。一名士兵与一位农民携手合力，推着“抗战”巨轮前进，巨轮下压着惨叫不已的日寇，表明军民紧密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幅漫画形象分明、通俗易懂，也被丰子恺收录在《漫文漫画》，他在配文《开出一条平正的大路来》中，不无远见地呼吁道：“这么伟大的‘抗战’，自然必须‘军’和‘民’合力，方能推进。只要捉住了敌人的一部分，慢慢推进，自会压碎敌人的全体。现在已经捉住了敌人

的脚。他的上半身还活着。大肆咆哮，似乎很威势的样子。其实这已是救命的喊声了。因为‘抗战’慢慢地推进，总有一天压碎他的全身，压得他同地一样平。推进‘抗战’的‘军’和‘民’！你我压平了这敌人之后，不要就以为成功而住手。须得再推进去，开出一条平正的大路来，让世间一切的人走。”



《候敌深入，一鼓歼灭》

《候敌深入，一鼓歼灭》发表于1938年5月1日《抗战漫画》第9期的封面，把野蛮的日寇比作贪婪的蜘蛛，最后碾碎在抗日军民的手心，无论是寓意还是表现形式，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极具感染力。

“三毛之父”张乐平在武汉期间的抗战宣传，表现出一名漫画家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怀，在动员民众参加抗战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吴继金，湖北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红色美术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翁婉琳，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郝梦龄将军之女郝慧英采访记

◇ 尹新秋

今年，是抗战胜利 80 周年，想起 2001 年对郝梦龄将军长女郝慧英的采访。那年，武汉电视台海外中心摄制纪录片《烽火岁月》，首先想到郝梦龄将军。他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壮烈殉国时，家小在武汉。

解放后，郝慧英在武汉十七中当生物老师，她老伴是十八中物理老师，两老住在解放公园路十八中宿舍。2001 年 6 月 14 日上午，我们摄制组去她家中拍摄访谈。

父亲赴战前撕碎了遗书

郝梦龄（1898—1937），河北藁城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从连长到军长。1934

年厌倦内战，请求解甲归田，未获批准。1937 年 5 月，在贵州驻防时再度请辞，仍未如愿，派去陆军大学学习。赴校途中，卢沟桥事变爆发，立即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率部北上路过武汉，与家人有过几天团聚。

郝慧英说，父亲走的那天，母亲告诉她，父亲一晚没睡好，在那里写了撕、撕了写。她在母亲房间抽屉找到父亲写的信，信封上写着“留给慧英儿 二十七年（1938 年）拆阅”。她不明白，为什么要到明年才能拆阅，问父亲，父亲把信撕了，丢在痰盂里。

父亲出去后，郝慧英将纸片捡起，拼起来一看，是写给她们兄妹五人的遗书。主要意思是说，这一次是关系我们中华民族生



郝梦龄遗像

死存亡的战争，我身为军人，必须参加。如果不幸我牺牲了的话，你们兄弟姊妹要好好学习，孝敬你们的祖母，听你们妈妈的话。至于你们的学费，我个人没有钱，将来你们可以进遗族学校。

郝慧英是长女，那年 15 岁，跟父亲接触最多，回忆起 64 年前的一幕，总是双眼潮湿一时无语。

1937 年 9 月 17 日下午，郝梦龄前往大智门火车站，郝慧英跟了去。火车站全都是兵，黑压压的一大片。她不知道父亲看没看到她，更没想到车站一别便是永别。她永远记住了父亲的样子：并没有怎样依依不舍，忙着跟部下说话。

郝梦龄老家离石家庄 30 多公里。郝梦龄率部到石家庄后，骑马回了趟家乡，看望亲朋好友。他是专门来告别的。

当时，平津已经沦陷。日军占领察哈尔和河北中部，又重兵围攻山西。忻口，是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忻口会战，是华北战场上非常重要的一战，国共两党许多重要

人物，都在忻口一线。郝梦龄被任命为中央地区前敌总指挥，指挥第 9 军和晋绥军第 19、35、65 军等部，在主阵地阻击日军。

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中的王牌。以飞机、大炮、坦克等精良武器装备，组成“立体战争”的密集火力网，5—6 万人向忻口阵地猛攻。郝梦龄率部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一线。10 月 12 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敌我双方步炮兵主力，在 204 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竟易手 13 次之多。15 日夜，总司令卫立煌增派 7 个旅交郝梦龄指挥。16 日凌晨，反攻大军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连克几个山头。

郝慧英说，日本兵四处溃散，父亲和师长刘家麒、旅长郑廷珍，一起冲出指挥壕，前往另一个高地指挥作战。敌人四挺机关枪朝他们扫射，三个人都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了忻口。他们倒下的地方，离敌人阵地只有 200 米。父亲当时还没死，送往太原抢救途中断的气，擦血的棉花有一箱子。

郝慧英说，父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在家时写的遗书是这样说，后来在前线写的日记和遗书也是这样说：“一天不死，抗战任务一天不能算完。”他身边的人当时都劝军长在指挥壕指挥，父亲说，前线督战是自己的职责，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忻口会战，我军每天 1000 多人死伤，是敌军的几倍。战斗最激烈时，一小时打掉一个团。日军占有军事优势，弱势军队所能依凭的，除了正义，就是士气。

郝梦龄将军相信，身先士卒是最好的指挥。郝慧英总记得，父亲喜欢读文天祥、岳飞的故事。岳飞说过，要天下太平，得武将不怕死，文官不贪财。

汉口《大公报》报道说：“民国以来，军长之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将军为第一人。”

父亲血衣上好多弹孔

1937年10月24日，郝梦龄、刘家麒将军的灵柩，从太原运回武汉。回武汉是将军的遗愿。武汉各界代表4000多人在大智门火车站迎灵。素车白马，全城悲恸，万人公祭，下半旗志哀。蒋介石委托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主祭。国民政府以国葬规格，将郝梦龄葬在武昌伏虎山。12月6日，国民政府追授郝梦龄为陆军上将，蒋介石写下祭文。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讲话，高度评价郝梦龄“给了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1946年，汉口日租界的北小路命名为“郝梦龄路”。

郝梦龄将军这些哀荣，郝慧英都没有说。只说灵柩运回武汉时，有人把郝梦龄用谐音写成“郝梦麟”，同刘家麒一起喻指“麒麟”。

郝慧英没看到父亲的遗体，遗体已在太原买棺材成殓了，只看到血衣，常穿的那件灰军装血迹斑斑，上面好多弹孔。给父亲擦血的那一箱棉花，也运回了武汉。

郝慧英说，父亲常说人生在世，“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父亲不置家产，房子是租的。母亲曾想买一套房子，父亲不肯，说军人要四海为家。每次得到奖赏都分给部下，家里没什么积蓄。父亲殉国后，武汉各界纷纷捐款。捐款和抚恤金加起来有6万现洋，但开销也大。一家七口，上有奶奶和母亲，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妹妹两岁，小弟弟才三个月。遇上通货膨胀，

6万元贬得值不了多少钱。没几年，钱就用光了。

1938年武汉沦陷，郝慧英和弟妹跟母亲辗转到重庆。小弟弟一岁多，因病夭亡。父亲说的遗族学校因抗战停办，她和两个弟弟只得进私立学校。暑假时，姐弟就出去赚学费，茶水、西瓜都卖过。一次，冯玉祥手下一位将领同她弟弟聊起来，才知道卖茶的学生是抗日名将郝梦龄之子。回去告诉冯玉祥，冯玉祥告诉蒋介石，送来两万现洋。一家人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政府抚恤金和别人接济。后来，姐弟上学报销，不用再操心学费的事。

1945年抗战胜利，一家人回到武汉，在汉口长春街租房子住，有关部门看到不宽敞，给了一栋房子。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姐弟四人都大学毕业，实现了父亲的遗愿。

父母“合影”给岁月留白

电视节目需要画面语言。与郝梦龄将军相关的任何一种“画面”，都加深了郝慧英的伤感。



郝慧英夫妇在郝梦龄遗像前

采访时，我们想找一张将军的照片做衬景，父亲在身边，女儿的讲述会增加情感分量。电视柜上，摆着郝梦龄夫妇的照片，半身照，装在一个木制相框里。郝梦龄身着军装，枪套斜挎右肩，是书上网上常见的那张戎装照。郝梦龄殉国时39岁，照片可能还要年轻一些。夫人剧幼秋1984年去世，享年85岁，是晚年照。一个壮年，一个耄耋老人，由一条白色中缝给岁月“留白”。

郝慧英说，很多人问过她，为什么不挑一张真正的合影。她说，父亲的照片，是从人家那里翻拍的。她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合影”也可以不显“年龄差”。但她觉得不好，追忆亲人，遗像应该接近生命的终点。慎终追远，这样的“年龄差”，会令人追思很远。

想找一张将军的单人照，郝慧英却找来一尊瓷像。说老家以她父亲为骄傲，曾为父亲烧制三种瓷像，前些年回老家，送了一尊给她。但瓷像太小，画面效果不好。这时，老伴提醒她，房间有张郝梦龄的单人照。郝慧英犹豫了一阵拿了出来，全身照，是找老报纸翻拍下来放大的。郝梦龄戴眼镜，穿长大衣。照片两边和天头，写满了将军的事迹介绍和褒奖，可右边画了一个圈占近四分之一，也不太适宜上镜头。

郝梦龄的照片，最后写给妻子的信，原件藏于一家档案馆，当时武汉各大报纸都在醒目位置刊登。1938年的小学国语课本中，用“中国第一个军长”的题目描写他。1941年郝梦龄殉国四周年纪念日，音乐家冼星海创作《郝梦龄将军悼歌》……郝梦龄的名字，郝梦龄的事迹，抗战期间是提振士气的一大动力，抗战之后凝结为民族的集体记忆。

1983年，民政部追认郝梦龄为革命烈士，郝梦龄墓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2009年，



2014年，郝慧英在郝梦龄路牌下

郝梦龄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郝梦龄名列其中。

2001年后，我一直留意有关郝慧英老人的消息。2006年，她老伴去世，因无子女由侄女照顾。2015年，她90多岁高龄还接受媒体采访。不同媒体的照片选了相同的背景：郝慧英站在“郝梦龄路”标牌下望向远方。

尹新秋，武汉电视台高级编辑，原海外专题部主任

笔墨六十载，倥偬岁月稠

◇ 孙恩道

和许多从艺人一样，我是从小胡涂乱抹到为了糊口而走上这条绘画道路的。我做过学生、农民、工人、士兵、记者、编辑，直到当上出版社社长、省美协副主席。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就是个手艺人，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劳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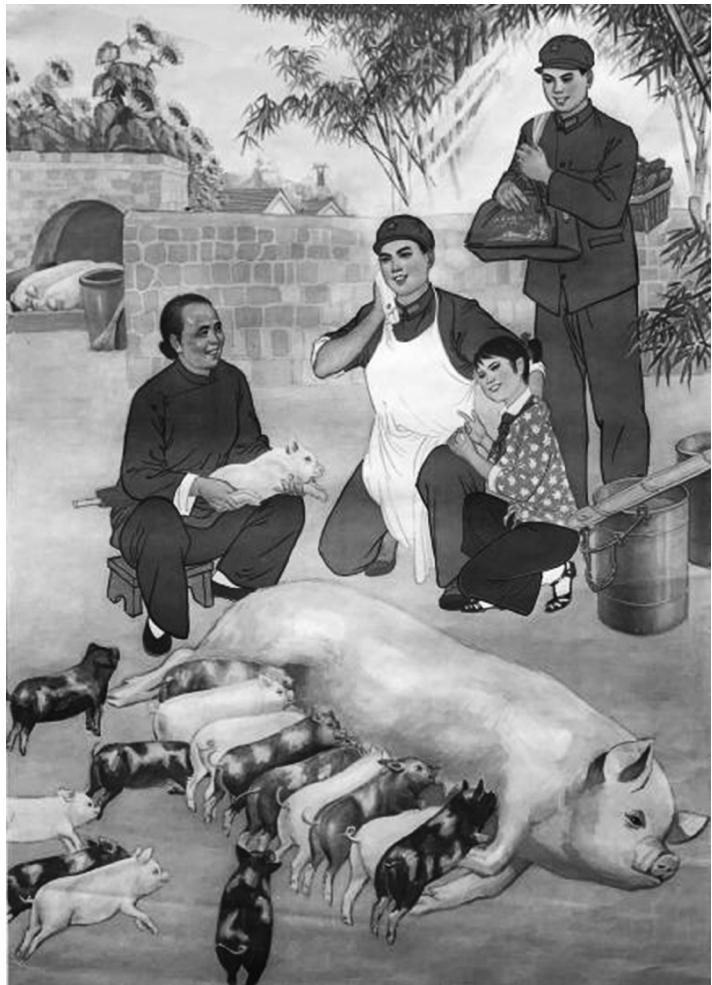
从黄土坡到火热军营

1950年，我出生于河南巩县东侯村，村南是连绵的伏牛山，北望是奔腾的黄河。这片土地是河洛文化的发祥地，自古文脉深厚。曾祖父是一方乡绅，虽历经战乱家道中落，但幼时的我仍时常在老宅的阁楼上翻出几幅残破的古画和古书，这大概是这个家族残留下来的文化基因。

父母亲极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家境贫寒的情况下，大哥在解放初期便上了大学。大哥见我从小喜爱绘画，特意为我寻来苏联克鲁普斯卡娅人民创作室的《业余绘画教材》一书，这便成为我自学的教材。在老家的煤油灯下，我用三年的业余时间，系统自学了所规定的课程，从静物写生到想象创作，从素描到色彩，打下了西学绘画的基本功。

学画期间，我有幸结识了从湖北艺术学院下放回家的同乡陈天然老师，县文化馆美术干部白春堂老师，还有时在广州美术学院就读的大学生王桂宝，以及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原非等。在这种文化氛围里，我的自学之路得以走的规范和宽阔。

1966年，我辍学回乡。白天田间劳作，



1972年《妈妈夸我干得好》参加全国年画展览

夜晚挑灯绘画，并不断参加县文化馆、乡镇企业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绘制毛主席像和大型宣传画，街头巷尾的阶级斗争展览，都成了我最初的“创作舞台”。

1970年，我被武汉军区破格征召入伍，所在部队的任务是开垦江汉平原的沉湖。生活虽然艰苦，但我背着画板穿梭于营地，记录军旅生活的点点滴滴。在这里，我画过战士冲锋、老乡支前，也画过雷锋的故事。

1972年初夏，我在17军50师参加了武汉军区举办的美术创作学习班。当时武汉军区从下辖三个野战军、两个省军区系统、数个独立师的几十万官兵中，选调美术骨干30余人，集中在第三招待所训练和学习，

每天由十多位从全国请来的著名画家授课。

这是一次全军区美术工作者的大集训，也是我艺术之路的真正起点。在这次为期近三个月的学习班上，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并创作了版画《一声令下》和年画《妈妈夸我干得好》两幅作品。创作过程中，经常得到范迪宽、林楷等老师多方面的指导，使之得以顺利完成，为我以后的专业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后来，《妈妈夸我干得好》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年画展览，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连环画《官渡之战》参加全军展览，并由《解放军画报》选登。

1975年，我调任武汉军区《战斗报》任美术编辑，开启人生新的旅途。12年间，我没有再参加任何美术展览，每天就一门心思扑在办报上。但绘画的基本功从未放松，白天穿梭于部队与报社，夜里为出版社画连环画。

其间，我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军队政治干部班。班里全是优秀政治干部，有些年纪比老师还大。记得教古代汉语的余老师讲唐诗，不从平仄讲起，偏从唐代的兵制、税赋说起。他说：“不知安史之乱的粮草怎么运，就读不懂杜甫的‘三吏三别’”。这种“立体化”“系统化”的思维深深影响了我，不能孤立地看待事物。艺术作品总应扎根于艺术家所生活的时代，画王维，需懂他的禅意，更要了解唐代佛教的盛行；画陶渊明，需品他的孤傲，也要知道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的黑暗。

在武大这几年的学习，让我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要求画家必须具备全面的文化素养，这是我们必须始终不懈践行的好传统，否则就如瘸腿登山，最终难以达到艺术的高峰。

从连环画到笔墨写意

1986年，武汉军区撤销，我转业至名家聚集、人才辈出的湖北美术出版社做编辑工作，获益匪浅。

这段时间，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我创作了《杜十娘》《聊斋故事》《续西游记》等连环画；绘制了包括《三十六计》《元曲三百首》等百余幅工笔插图，夜以继日，笔锋在纸上游走。这段经历锤炼了我的线描功力，也让我深刻领悟：编辑与画家皆需“杂学”——历史、文学、民俗都涉猎，方能赋予作品厚重底蕴。

创作《元曲三百首》前后用了一年多时间，在参考古籍的基础上，我对元曲进行了筛选，选取其中最有绘画意趣的三百首，请著名学者吴丈蜀审定并撰写前言。此书出版后多次重印重版，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并获得全国优秀插图奖。这是我在线描上取得的一次突破，得到美术界普遍关注。

2000年，我卸下了湖北美术出版社社长的职务，从事美术专业创作。这一年我已50岁，知命之年重新做起

了学生，到中国美术学院人物画研究生班进行深造，开始转型创作写意人物画。

在中国美术学院学习期间，我受到当代浙派代表性人物画家方增先、吴山明、刘国辉、程宝泓等名家的影响。在这个对传统笔墨尊崇的艺术殿堂，我真正领悟到水墨人物画的妙道要旨，也形成了艺术上的一次真正转折。真正深入到传统艺术的深层中去，吃透水墨写意中“笔墨”这一必修课，从而在原有扎实的造型基础上，得以建立自己的艺术语言。著名美学家刘纲纪先生评论我的作品有书卷气、古雅风、诗文境、人情味。

由此，我在国内外多次举办展览，专为人民大会堂绘制《八仙过海》，有多幅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中央党校、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及海内外人士广为收藏，参加第七、八、九、十届全国美展，出版有《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孙恩道》（人民美术出版



2006年《旧影》



2016年《商汤崛起·汤誓》

社)、《丹青典藏·孙恩道卷》《中国画名家长卷典藏·兰亭修禊图》、散文集《父亲的土地》等专著二十余种,代表作品有《旧影》《洪湖晓月》《兰亭修禊图》《父亲的土地》《老母亲》,以及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麦西莱甫》,在全国美术界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奠定了我在全国美术界的地位。

创作《商汤崛起·汤誓》

2011年,应“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组委会的邀约,我开始为国家博物馆创作高2.7米、宽5.3米的大型历史画作《商汤崛起·汤誓》。这是我一生中创作的耗时最长、投入毕生学识的巨幅作品。历时五年,数易其稿,按国家要求完成通过,有专家评价我顺利完成了历史交给我的任务。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一幅历史画,一定要客观真实的表现历史场景——

也是我这次创作的孜孜追求。要达到这个目的,面临巨大困难。一是历史久远,可借鉴的资料有限;二是当时历史画创作普遍存在形式主义,使作品表达流于表面,缺乏思想深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除了尽量挖掘历史资料、向古文化学者讨教学习外,尽量扩大视觉范围,捕捉最有效的信息。在深思熟虑之后,我除了表现商汤起誓出兵的壮阔情景外,还刻画了历经战争摧残的瞎眼老者、骨瘦如柴的孩子等形象,产生强烈对比,更具张力,表达对战争的控诉,深化了主题,使作品有了悲壮的色彩,更耐人寻味。

孙恩道,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武汉大学客座教授、湖北省文史馆馆员、湖北美协理事会顾问